

彼岸

2019年第1期（总第1期）

编者按	2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6
中国工人运动的下一个十年	18
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	28
井冈山今何在？——论佳士工人斗争与革命复兴的前景	31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36
佳士斗争的争论与反思	39
“适应节奏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	47
“甩脱尾巴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的短评	60
论左翼持久战	68
与红色中国网“座椅”同志的论战——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中	78
红色中国网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代“座椅”同志答复尤琳同志	81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85
远航一号致“八青年”负责人	101

编者按

2018年5月至8月，在广东省深圳市爆发了佳士科技公司工人争取建立自主工会的斗争和主要由进步青年组成的“佳士工人声援团”为抗议警察镇压和迫害、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而进行的声援斗争。这次斗争是自资本主义复辟以来，第一次由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领导的新工人斗争，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向着全面觉醒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由于资产阶级当局的镇压，佳士工人争取建立自主工会的斗争和“声援团”的斗争均告失败，数十名工人和青年被捕，马列毛左派在青年中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佳士工人和“声援团”斗争的失败，不仅反映了一些青年同志在策略方面的严重错误，而且证明，以在沿海地区建立资产阶级允许存在的“合法工会”为目标的工人运动路线已经遭到失败。围绕这次佳士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工人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在马列毛左派各小组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彼岸》杂志的创刊号编辑整理了这次讨论中的一些代表性文章，供各位读者参考。我们希望并且相信，通过比较和鉴别，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冷静的反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理论结合实际，马列毛主义积极分子一定能够从失败中站起来，寻找并且发现在当前条件下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以及中国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和解放的道路。

我们向读者推荐的第一篇文章是在2019年元旦前发表的“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在这份建议书中，红色中国网工作组明确提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以建立资产阶级承认的“合法工会”为目标的工人运动是必然要失败的。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弱点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而不是依赖于少数青年积极分子从外部的灌输。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下一个十年”中，水边同志认为，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资本主义高速积累的“黄金时代”一度为以广东新工人为中心、以劳工社会组织和集体谈判为媒介的工人斗争方式提供了有限的空间。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原来

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继续照搬以往的斗争方式必然要蒙受损失。水边同志主张，中国工人斗争的重心必然要向资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转移。

在“佳士工人声援团”斗争高潮期间，曾经有一些同志对于这次斗争寄托了过高的期望并给予了一些不完全符合实际的评价。在这一期《彼岸》中，包括了两篇可以反映这种倾向的文章。在“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一文中，潘毅教授认为，佳士工人维权已经开启了“中国工运的全新篇章”，中国工人已经从单纯的经济主体，转变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主体。在“井冈山今何在？”一文中，洛崇同志提出，今天的“井冈山”就在佳士等一切工厂区的工厂中，认为佳士工人的斗争表现出了成熟的策略、严密的组织，是工人觉醒的典范。洛崇同志还认为，佳士工人的斗争，其水平已经超过了国企老工人，是争取基层民主的“政治斗争”。左翼必须把“到工人中去”作为自己的战略中心任务。

相比之下，在深圳当局大批抓捕青年积极分子后两天，远航一号同志在“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一文中，一方面积极评价了佳士斗争的意义并高度赞扬了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初步总结了佳士斗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工人斗争一般来说只能是经济斗争，斗争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靠发动全国左派声援的方法代替不了当地工人自身的组织力量。

2018年12月初，在部分马列毛青年中围绕着如何总结佳士斗争的经验教训发生了争论。为了答复一些青年同志对于“声援团”斗争策略的质疑，青年先锋网站发表了“佳士斗争的争论与反思”。青年先锋网首先不承认佳士斗争已经“失败”。青年先锋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只能走先组建工会的道路，反对对路线问题开展争论，同时拒绝承认“声援团”在斗争策略方面犯有任何错误。

生活在香港的长期工运观察家李星撰写了“佳士事件短评”，认为佳士斗争在时机把握方面尚欠火候，大多数工人没有发动起来，存在着“拔苗助长”的问题。结果，“声援团”对李星猛烈抨击，认为李星一文“充满了狭隘经济主义、尾巴主义”，令“声援团”“感到荒唐，进而愤怒”。从“声援团”对李星的反驳中，可以看出，“声援团”同志对于哪怕是温和的、细节方面的批评也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

12月26日，激流网举办纪念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活动。五百二同志在纪念会上发言，题为“论左翼持久战”。在这篇发言中，五百二同志以隐晦的方式对佳士斗争提出了批评。五百二同志发言中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但是，五百二同志错误地认为，佳士斗争的失败是因为照搬了老工人的斗争经验。五百二同志批评了佳士斗争的“速胜论”，却又认为无产阶级的组织只能靠左翼青年的长期灌输才能建立起来。对于五百二同志发言的错误，红色中国网的编辑提出了批评。红色中国网编辑的批评意见附于五百二同志的发言稿之后，供读者参考。

在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发表以后，在左派青年中引起了热烈讨论。“声援团”以尤玲的名义对红色中国网展开批判，认为红色中国网的建议书不仅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反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声援团”“插刀”。尤玲同志还认为，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必须要走到沿海地区发动新工人组建工会的道路。远航一号代表红色中国网对尤玲同志的批判做了答复，再次指出那种通过走资产阶级法律程序成立工会来搞工运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主要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不是靠知识分子或左翼青年用包办代替的方法从外部搞“发动”。

在关于佳士斗争经验教训的讨论中，很多青年同志提出了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条件下，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怎样进行合法斗争的问题。针对这些青年同志提出的问题，结合严元章同志领导“八青年关注团”斗争的经验，远航一号撰写了“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远航一号同志指出，必须要区分公开斗争与合法斗争。在今天中国具体的阶级斗争条件下，大量的群众斗争是公开的但是非法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成败只能取决于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谓合法斗争，指的不是是否合乎资产阶级法律条文，而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资产阶级一般不会镇压的、特殊条件下的群众斗争。即使是合法斗争，仅仅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也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远航一号介绍了严元章等同志在“八青年关注团”斗争中所采取的斗争策略，通过与“声援团”的斗争相比较，进一步总结了佳士斗争失败在策略方面的经验教训。

“声援团”同志在路线与斗争策略方面的错误，实际上都反映了“声援团”的骨干和一般成员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向往马列毛主义的进步青年仍然没有摆脱的小资产阶级

局限性。这些局限性，还在“八青年关注团”斗争时期，就已经有所暴露。2018年2月下旬，在“八青年”中的四名同志网上追逃撤销后，在“八青年”主要负责人与严元章等同志之间围绕着下一步斗争策略曾经发生激烈争论。这一期《彼岸》的最后一篇文章向大家介绍远航一号当时代表严元章等同志致“八青年”主要负责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远航一号同志警告，如果“八青年”一意孤行、继续冒进，将给整个左派带来严重后果。这个警告，在几个月之后，不幸而言中。

2019年，进步青年向何处去？ ——红色中国网工作组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

过去几个月，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高校青年积极分子经历了一场大风大浪。一些同志被捕了，正在经受考验。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一些牺牲，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有志于远大理想的青年积极分子，应当轻易冒险、轻易牺牲。可以说，这次的牺牲大大超出了必要的限度。这次挫折，有可能在一部分青年积极分子中导致消极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其中一些，或者在经历一个短暂的亢奋期以后，又转入消沉。另一方面，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也可能会有批优秀的青年积极分子，能够经受住考验，并且通过深入的反思，使得自己在思想上和品质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从而成为未来斗争的中坚。

为了使得一些青年能够尽快地从悲观失望的阴影中走出来，也为了防止另外一些青年继续盲动下去，又为了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有必要对过去几个月的斗争，乃至过去几年青年工作的整个方向，加以深入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未来正确的道路。

中国当代的“马列毛左派”，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到目前为止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3年至2012年，是乌有之乡、旗帜网、工人网、东方红网等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这些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大体上是四种。一是在国企工人反私有化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批老工人积极分子，二是所谓“老左派”（与原官僚特权集团有一定联系、尚未完全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一部分老共产党员），三是原文革造反派积极分子，四是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代表（如韩德强、张宏良）。上述传统左派的力量在2012年薄熙来事件前后达到顶峰。此后，随着国企私有化的完成、他们自身社会基础的变化，其政治影响有所下降。

从2012年以后，进入了高校青年“马列毛左派”小组大发展的时期。青年左派小组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高校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马列毛左派思想在青年中影响的增长，说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现实利益，使得他们在“阶级固化”、买不起房、结不起婚、谈不起恋爱等困境的压

迫下感受到了实在的无产阶级化的威胁。这种现实的经济矛盾，在大批青年头脑中得到反映，进而引起越来越多的青年由自发到自觉地向马列毛主义靠拢。

青年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一社会现象本身，是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结果，是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但就青年左派的现实社会基础来说，他们还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运动，也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由于这些青年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出身于其他阶级而变化为小资产阶级的），由于他们赖以生存并习以为常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乃至一部分意识形态和话语，在他们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并被无产阶级改造以前，不可避免地要从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出发看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下实际上主张和宣传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观点，不可避免地要沾染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

在目前的青年左派中，这种小资产阶级属性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在理论上，在对现实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的认识上，这突出地表现为所谓“中帝论”的泛滥。如我们一些同志在关于“中帝论”问题的论战中所指出的，将中国资本主义吹捧为是帝国主义，实际上反映了相当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畏惧资产阶级，夸大资产阶级的“强大”，用口头激进来掩盖自己实际上认为革命无望、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的真实心理。在社会实践方面，则表现为重视新工人而忽视老工人或老工人的后代，重视南方沿海而忽视广大的内陆地区，重视资产阶级的法律程序而忽视工人阶级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重视媒体网络而轻视长期扎实的群众工作。

青年左派的小资产阶级属性还表现在其若干骨干人员的个人英雄主义（包括某些人的政治野心），表现在各小组内部的宗教化倾向（少数骨干分子自封“理论权威”，而一般成员则被要求盲目服从，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表现在某些派系的严重宗派主义倾向（以小集团的利益和立场来排斥整个“马列毛左派”的利益和立场，更不必说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

此次佳士工人斗争的失败，除了许多具体策略问题值得深入总结以外，还暴露出了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在最近以“青年先锋”名义发表的一篇总结文章中，表达了许多青年同

志对于中国工人斗争发展路线的一般看法。在他们看来，中国工人斗争的发展，必须要像欧美工人那样，像韩、港、台工人那样，首先要争取普遍建立正规的、公开的工会，要争取资产阶级法律的批准（合法化），进而争取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而建立工会的方法，则主要是要靠懂得马列毛主义“理论”的青年下厂，向工人积极分子“灌输”，发动工人开展斗争；而“斗争”的方法，则实际上表现为向资本家请愿，如被镇压，则向资产阶级专政机关请愿，如再被镇压，则企图诉诸社会舆论的神奇力量。

这样一套小资产阶级的“工运”路线，就思想方法上来说，其错误在于，咱们的某些青年积极分子，只知道从书本出发（而且没有读几本书），从片面理解的外国经验出发，而没有做调查研究，既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也不注意了解外国阶级斗争的新动态。

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是所谓“帝国主义”吗，是所谓与美帝争霸吗？都不是的。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就是说，中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因为中国在与核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仍然受到不平等交换的大量剥削，因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在国际资本主义的分工中得不到超额利润或超额剩余价值而只能得到一般利润。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仍然是出口制造业，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仍然要依靠剥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来维持其所谓竞争力。

所以，对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剥削，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命根子。这就决定了，只要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在“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还在“正常”统治，就决不可能听任工人阶级普遍地、大量地、公开地、合法地组织可以作为工人经济斗争有力工具的工会。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那样愚蠢的。一些小资理论家自欺欺人地宣传说，发展工会、保护工人权益，可以有助于“劳资和谐”、可以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这只能欺骗自己，也许还能欺骗一些尚不觉悟的工人，但是资产阶级是不会上这个当的。

当然，如果未来中国出现了革命形势，从而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普遍发动起来的工人阶级是有可能大量地、自发地提出组织工会与资本家开展斗争的要求

的。但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工人阶级的要求就绝不会以工会为界限，而垂死的资产阶级也绝不会幻想靠工会等有限的让步就可以维持其阶级统治。

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来看，工会这一组织方式确实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国家中为工人阶级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提供了适当的历史工具。但是这一历史经验，其主要起作用的时期是二十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即使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也常常被镇压，或者限制在少数熟练工人范围内），其较为成功的地理范围，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即北美和西欧，以及后来加入核心区的日、韩、港、台等。即使在有组织工会的鼎盛时期，工会充其量也只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社会改良的作用，而并没有发挥充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促进社会革命性转变的作用。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即使在老牌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会也已经普遍衰落。目前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会会员（其中，在北美，工会会员数量已经沦为工人阶级中的极少数；在除北欧以外的西欧诸国，也已经下降为相对少数）。

在世界范围的工会以及社会改良都已经普遍衰落的大环境下，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政治条件下，工会反而会成为工人阶级提高斗争力量、发展阶级觉悟的有效工具呢？

在这次佳士工人斗争过程中，主要积极分子先是天真地要求资产阶级的官方工会帮助他们建立工会；在受到资本家迫害后，进而幼稚地请求警察当局纠正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这种天真和幼稚，如果是作为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发生的一种现象，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但是作为号称自觉的“马列毛主义者”所领导的斗争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则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

中国目前基本的政治现实是没有一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这样的常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懂得，但是咱们的“先进”的马列毛主义青年，却恰恰不懂。在十分特定的条件下，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的虚伪，为了达到教育一般群众的目的，有时是可以采取明知资产阶级不会做、做不到，却故意要求对方落实一些纸面上的法律条文的策略的。但是，这样

的策略，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才可以采取，并且主要是以宣传和揭露为目的，而不是以落实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为目的。

但是，在佳士工人斗争中，主导这次斗争的积极分子从一开始在主观上就幻想可以成立正规的、公开的、受资产阶级法律保护工会。当这一企图被资产阶级警察的镇压摧毁以后，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又幻想依靠左派声援、海外舆论的压力就可以让资产阶级政府回心转意。我们不反对，在特定的条件下，在有确实有利的时机时，运用社会舆论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或者实现某种宣传目的。但是，一般来说，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仍然在照常运转的时候，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实际上，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也不宜夸大社会舆论的作用）。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工人斗争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只有当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利用某些局部有利条件，能够给当地资本家和地方官僚确实形成威胁、确实迫使其付出实际代价时（如工人的罢工和怠工给资本家带来经济损失、如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特定矛盾威胁到地方官僚的政绩和升迁），才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官僚做出让步；而社会舆论的动员和“声援”则一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佳士斗争的主要积极分子对于阶级斗争的这一基本现实没有认识，而将全部幻想寄托于社会舆论的动员上；失败后，又将全部责任推诿于社会舆论动员不够或者别人对他们“声援”不够，却从来没有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难道害怕“声援”吗？盲目“声援”的结果，是左派力量的一大部分完全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而青年左派的很大一支几乎全军覆没，在资产阶级镇压面前垮了下来。

那么，中国“马列毛左派”的正确道路在哪里呢？中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又在哪里呢？

作为向往革命的进步青年，如果已经下定决心，要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要将自己的一生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那么就不能不积极思考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政权问题。口头上大谈“革命”，可是满脑子想的都是工会、都是资产阶级民主，这样

的精神状态是永远也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的。要了解革命的道理，就要敢于思考现存社会秩序灭亡的问题。

马列毛主义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社会的某个阶段，其产生、发展和灭亡，要从其内在矛盾中寻找规律。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产物，而不是少数“先进”人物从外面灌输的结果。

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现在已经快两个世纪了，世界无产阶级还没有胜利。所以，仅仅照搬外国的经验，照搬欧美韩港台的经验，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经验，是找不到中国革命胜利的出路的。要了解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条件和历史可能性，我们就必须认真分析和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特有的弱点，了解中国无产阶级特有的优点。

如上所述，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半外围国家，中国经济参加国际资本主义分工的主要部门是出口制造业，而出口制造业又建立在对大量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所以，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造成一个数量庞大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又必然要逐步地组织起来并且按照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展开越来越有力的斗争。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式，不是照搬外国的经验，也不是照搬社会运动的教科书，而是根据中国工人运动自己的传统，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不断地争取局部的进步和胜利。以往的斗争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常规的、公开的、永久性的工人组织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工人阶级斗争需要的。实践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没有必要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的那些组织方式。比如通钢工人的斗争，就是在表面自发的形式下而形成的有高度组织性的斗争，并给资产阶级以沉重打击，违反了一切资产阶级法律，当局还不敢打击报复。只要局部条件有利，工人斗争有力量，“违法”也不妨碍工人斗争的局部胜利。反之，如果当时当地条件不利，工人没有发动起来，最“合法”的请愿也会被资产阶级无情镇压。在新工人斗争中，也有大量的实际例子。在日常劳动和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产生一些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优秀分子；当出现对工人有利、对资本家不利的特定

时机时，这些优秀分子便将工人发动起来，通过采取一些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实际损失和代价的行动，迫使资本家做出让步。由于这种发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隐蔽、半公开或公开等不同方式，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资本家打击报复给工人斗争带来的危害（在现阶段，要完全避免这种危害，仍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工人的这些斗争方式，看起来似乎原始，似乎不够正规，但却是实在有效的。中国近年来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与以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实际，抱着科学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若干年认真的、负责任的研究，可以认定：目前总的形势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剥削的困难在增加，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在深化。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力量的上升，不仅反映在无产阶级数量的增长，而且反映在工人斗争次数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平均剥削率近年来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又进一步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平均利润率正在趋于下降）。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工人阶级斗争力量上升的程度，就必然要突破中国资本主义积累秩序所能容纳的狭隘界限，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不可避免。

从半外围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情况，不是历史上孤立的情况，而是过去在一些半外围国家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情况：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运动都将发生高涨。作为半外围国家，既不能在高技术领域与核心国家竞争，又不能低成本领域与外围国家竞争，从而其资本积累的要求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要求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陷入积累危机和政治危机。前苏联、东欧、拉美诸国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南欧诸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韩、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不过，以往在上述半外围国家，这样的积累危机最后都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某种方式而得到解决。

就半外围国家阶级斗争的发展前途来说，当工人阶级力量的上升发展到与资本主义积累秩序尖锐不可调和时，无非是三种解决办法。或者，该半外围国家设法上升为核心国家，通过剥削世界其他地方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从而缓和内部阶级矛盾（如日、韩、

台、港）。某些无法上升到核心国家的半外围国家因为拥有丰富的高价值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也可以在某些时期通过攫取资源租金来缓和内部矛盾（如俄罗斯、巴西、中东海湾国家）。或者，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全力进攻，并结合将部分资本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和资源更加廉价地区等办法，在打垮工人阶级以后，重建资本主义积累秩序（这是美、欧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实行的策略；但是在半外围国家条件下，还没有先例）。或者，资产阶级无力解决其积累危机，也无力解决其政治和社会矛盾，无产阶级领导其他各劳动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统治，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社会（这将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前途）。

我们认为，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到资产阶级无法轻易打垮的地步。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也不可能在中国以外找到足够大的有丰富廉价劳动力且具备资本积累其他必需条件的地区。同样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并基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两级分化的基本规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体系，而绝不可能是一个多数人剥削少数人或者世界上半数人口剥削另外一半人口的体系），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掌握某些半外围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恰恰相反，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着尖锐的资源和环境矛盾。由于这样几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将无法解决其未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决定中国未来历史命运的钥匙，必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

各青年左派小组的工作，应当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与革命形势来临以后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实践方面的工作，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相结合，但这种结合的主要目的，不是“启发”、“领导”、“发动”工人斗争，而是努力学习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和经验，与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中的优秀分子相互学习，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要认识并且相信，阶级斗争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少数知识分子的“灌输”，而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少数有理想、有激情的青年，面对资产阶级庞大国家机器的镇压、面对资产阶

级媒体的污蔑，是没有多少力量的；但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亿万工人阶级，则蕴藏着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在理论工作方面，青年同志不仅要学习马列毛经典，而且要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发展，要了解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新发展、新动向，要围绕着在当前中国具体条件下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一中心问题。凡是无助于解决这一中心问题的，如“中帝论”等错误思潮，要加以摒弃和批判。要解决这一中心问题，就必须正确地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找到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弱点，找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只有这样，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而不是灰暗的；只有这样，广大青年同志的革命信心，才会是坚定持久的，而不是建立在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沙滩之上。

关于未来的革命形势和具体路径，这有待于未来阶级斗争的实践，一切理论推测在现阶段都不免于盲目和苍白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做出这样几种估计。未来的中国革命，既不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城市武装起义），也不会是走井冈山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的持久人民战争），也不会先经历一个长期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长期稳定存在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不十分尖锐，从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阶级之间、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存在着相对稳定妥协的政治条件。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廉价劳动力残酷剥削的基础上，中国资本主义在其正常发展时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积累危机爆发以后，由于资产阶级无法克服未来的积累危机，还是不具备建立长期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毛左派要下定这样的决心，不要幻想资产阶级会有朝一日，给左派和无产阶级提供充分的、形式上的政治自由，使得我们可以从容地、和平民主地、不付个人代价地争取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凡是有稳定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没有一个曾经实现向着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的劳动人民有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我们在中国搞革命，一方面要了解外国劳动人民斗争的好经验，但是首先要重视、发扬中国革命自己的好传统。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事情是反复发生的。中原王朝衰落以

后，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形势在历史上是常见的。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内外矛盾尖锐，而导致中央政权瓦解、地方豪强兴起的情况，也不乏其例。

在未来积累危机与革命形势发生以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一下子取得全国胜利，而必然有一个比较长时期的、跨度几十年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无产阶级将完成从经济斗争到真正的政治斗争的过渡（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政治斗争，必然是以政权为目的的，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而不是以争取工会等资产阶级民主权利为目的；后者，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无产阶级将组成为政党，并在政治上逐步成熟起来，并领导其他各阶级的劳动群众，最终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

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全国范围的领导力量之前，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样的根据地不是像井冈山、江西苏区、陕甘宁边区那样建立在土地革命基础上的农村根据地，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暂时仍然被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着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这样的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当然是无法存在的。但是在积累危机爆发且资产阶级无力克服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遭到决定性削弱以后，则是完全可以存在的。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资产阶级力量在全国范围的分布不是均齐划一的，而是有强有弱的。在那些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在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全面爆发、资产阶级统治全面动摇的条件下，首先出现一批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完全可能的。

那么，这样的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无产阶级力量又相对强大的地方，会是在沿海各地区吗？我们认为不是的。沿海地区，恰恰是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那里，虽然无产阶级的数量也比较众多，但是与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半无产阶级的数量相比，并不占绝对优势。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出口制造业大量雇佣外来“农民工”的特点，在沿海各地方的无产阶级与当地群众之间，还存在着特殊的地域矛盾。这种地域矛盾，是尤其不利于政权建设的。所以，在我们看来，虽然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时期，沿海各地区往往是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心（这一情况，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向内地转移，也在发生变化），却很可能不是未来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重心。

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来自于内地诸省市，生活、劳动于内地诸省市。中国的马列毛左派、青年积极分子，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重视内地的广大劳动群众。有抱负有主见的青年同志，要敢于“反潮流”，敢于做别人不屑做、不敢做的工作，敢于承担历史的责任，到内地去做长期、基础的群众工作，准备迎接未来的大变化。

我们建议，各青年左派小组，以此次佳士工人斗争失败为契机，深入全面地总结过去数年来青年左派工作的经验教训。要努力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主要是靠少数“先进”分子从外部灌输，还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客观上发展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造成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资本主义矛盾有哪些？哪些是属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存在的一般矛盾，哪些是属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前途是什么？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改良、“民主”、“集体谈判”，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两者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关于“中帝论”问题，要探讨和分析，如果中国是“帝国主义”，到底是指明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还是断绝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

关于青年左派积极分子的任务，要讨论，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左派积极分子，有哪些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怎样到无产阶级中去，向无产阶级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离开校园以后的青年积极分子，无法回避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离开校园的青年积极分子，向何处去？是继续不顾一切地、一窝蜂地、赶时髦随大流地涌到沿海地区向资产阶级请愿搞工会，还是到全国各地的广阔天地中去，到广大内地去，做长期普遍的群众工作，迎接未来的伟大斗争？

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积极分子，要正视自己的阶级出身，要经常检讨自己有没有个人英雄主义、有没有个人野心恶性膨胀、有没有“唯我独革”、有没有脱离群众、有没有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摆到了阶级利益之上。

以上建议和不成熟意见，希望得到一切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思考和响应。红色中国网工作组，愿意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虚心听取并答复来自各小组、各派别的意见，开展全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共同改造，共同进步。

中国工人运动的下一个十年

水边（2019年1月）

两种观点，一个路线

从 2018 年夏天以来，整个中国左派阵营都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状态中。这里面最明显的当然是在 8 月底，专政机关对于一批进步青年社会活动家的抓捕，并且在 11 月和 12 月，都进行了新的抓捕行动。不夸张的说，在过去十年里成长起来的相当一批优秀的青年活动家被一网打尽了。

除了这种对人身自由的直接限制，国家也收紧了套在整个左派身上的绳索，比如说，大批的左翼网络讨论群，进步网络媒体被直接封禁或者关停，这么密集和高效的压制手段，也就是在 2012 年重庆事件之后一段短时间曾经有过局部贯彻，比上现在这个却要明显见下风。另外，在非网络的现实环境里面，国家也采取了相当坚决的态度，大大缩小了或者是直接取消了大学校园里面的左翼学生社团的活动空间，这个举动是在过去 20 年里不曾有过的。我们下面也要说到，中国当代青年左派大多是在学校的左翼社团锻炼出来的，这个校园合法空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播种机和宣传队式的根据地。政权的这种斩草除根的姿态，显然意味着其对于左翼和左翼活动的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

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中，在左派分析者当中出现了两种典型的观点。有一种想法认为，青年革命者的路线是正确的，主要策略也是正确的，错误如果有，也是次要的，而且最大的问题不在这些一线活动家，而是来自全国左翼的支持不力。最近部分青年人组织的佳士声援团的文章里面，就明确的表达了这个意见。甚至在某些同志看来，虽然人也抓了，既定的任务也都没有达成，但是佳士的斗争并不是屡战屡败，而是在屡败屡战。

另一种是觉得青年革命者冒进了，不是群众不行，而是领导者在佳士的工人斗争问题上操之过急，应该徐徐图之。比如在最近的激流网的论述当中，就引用了毛主席持久战的观点，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应该避免佳士类的阵地战，而是要游击战，具体说就是宣传工作加上少量而深入的经济斗争。

这两种观点虽然在具体战术侧重上有所不同（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两种观点（也对应着当代左派的两个派别），在更根本的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整体分析上是高度一致的。我在这里把这两派共同的认识简要归纳为两点，那就是：第一个，打败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首先是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新工人聚集的东南沿海，尤其是在广东；第二个，阶级斗争有其天然法定程序，放之四海而皆准。最基础的是经济斗争（要工资，要退休金，要补偿等等），在这个基础之上必须要建立工会（不管是改造官方工会还是自己另建），从而工人阶级会走向更高一级的政治斗争，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挑战。

这两个认识，共同规定了这两派的革命路线。具体而言，就是这些活动家要在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发动工人，进行阶级斗争，其目标是争取资产阶级的让步妥协，这种妥协在经济上指的是改善血汗工厂的条件，在政治上，则指的是资产阶级逐渐承认劳工社会组织的合法性。这里说的劳工社会组织，不仅是指工会，也包括这些活动家组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团体。当然，现存的劳工社会组织不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上很大一部分都不是，但是这不妨碍这些革命活动家在现阶段也进行类似的组织建设。

另外，这些活动家大都是来自若干大学左翼社团的年轻人，他们思想走向马列毛主义也主要是在大学校园里面发生的（这些校园很自然的也多属于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方）。所以这种革命路线的很重要一部分也包括在校园里面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而这个行动本身也需要相当的政治空间，实际上从属于前面说的政治要求，即资产阶级对劳工社会组织的合法性的承认。

我姑且把这个叫以广东新工人为中心的革命路线，这个路线究竟走不走的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这个路线本身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在上面两种派别中选择一种就可以，但是如果这个路线本身就是不对的，那么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都会走向失败，那对整个中国革命来说，就真是大难临头。遗憾的是，这样重要的问题，却经常被不少同志和朋友们忽略了。在过去 10 年里，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在近期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发表的给青年同志的建议书中，就有很多精彩的论述，指出革命的未来不在沿海，而在内陆，不能死套工会的框框，而是要学习现实的具体的群众组织形式。

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为什么这样的路线在过去 10 年里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而到了现在却是走不下去了？要知道，如果这个路线一开始就显得不对劲，革命者又不是傻子，哪里会有人去追随？事实上，左翼社团在过去这十年里有了大发展，劳工组织有了大发展，新工人斗争数量不仅总体增长，而且就在广东爆发了几次著名的大罢工。这些事实无疑都增强了人们对这条路线的信心。可是，人还是这些人，本本也还是这些本本，怎么到了 2018 年结果就大相径庭了呢？

要谈 2018 年的问题，我们不妨倒退 20 年，从 90 年代末期谈起。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两个十年

上世纪的末期，中国资产阶级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私有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就是让几千万国企的工人失业，一夜回到解放前，而无以计数的公有财产都被少数私人巧取豪夺。

整个当代中国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是从这里开端的。红色中国网的严元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期从一名毛派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工人活动家，并创办了中国工人网等一系列工人研究网站和其他出版物。

这个时期的工人斗争，主题是反私有化和维护工人阶级主人公地位。值得提到的是，很多老工人，并不是一开头就反资本主义的，而是在 80 年代一度被走资派收买，普遍跟着改革开放走的。吃了资本主义的苦之后，这些工人才真正觉醒，而由于他们长期受毛主席教育的影响，能够从革命的眼光看问题，而不是只是看自己的饭碗，一旦有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他们很快成为一只政治上最坚决，认识上最深刻的革命力量。

这个年代，有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打工的新工人？当然有，数量还不少，比如到了 2003 年，光是在大陆私营企业和港台企业及其他外资工作的人就有 3000 多万人，这里面自然大部分是新工人，但是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角不是他们。

简而言之，尽管从数量上说，国企老工人在这第一个十年里并不占什么优势，但是他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同体会，让他们直接提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这批老工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人阶级。

但随着私有化的推进，国有企业越来越少，老工人虽然政治先进，认识彻底，但是发挥阶级力量的空间变小了。在离开了劳动场所之后，退休老工人在特定条件下还能起到定海神针的领袖作用，比如 2009 年通钢事件中的吴老。但是对于很多老工人来说，在斗争得到一定程度的下岗安置和退休补偿之后，进一步推动阶级斗争并不容易。

我们要特别认识到，中国的资本积累与老工人斗争的关系。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积累，需要把公有变私有，需要把铁饭碗甩掉，所以才产生了老工人的觉醒和坚决斗争。但是在顺利完成私有化之后，资本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得以进一步扩大积累，使得工人阶级主体变

成了新工人，使得老工人在整个资本主义中的影响又逐渐减小。在这个大的条件变化下，严元章等一批出色的工人活动家，也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这个探索也就是从 2007 年左右到现在，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二个十年，这个时期唱主角的就是两亿多新工人了。

新工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提出像样的政治目标，而主要是着重各种经济斗争上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新工人在过去十年的经济斗争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平均的工资增长速度长期高于总产出的增长速度。这也就意味着每单位产值里面，分给工人的份额是变大的。我们往往用劳动份额来描述这个比例，从全国的数据来看，在 2008 年以前，劳动份额是长期下降的，也就是工人阶级整体在步步后退，而从 2008 年开始，这个份额就基本不下降了，而且还有了相当的回升。

于此同时，工人斗争，尤其是新工人斗争，增长的速度也很快。比如我们参考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数字，那么整个罢工的数量从 2011 年到 2015 年从 184 起增长到了 2774 起。这个增长速度，哪怕是扣除一些统计上的问题，也是相当惊人的。

所以说，虽然工人阶级的斗争从水平上说，到了第二个十年有明显的下降，但是从规模和强度上都超过了之前一个十年。这种阶级斗争的快速发展和工人斗争力量的增长，主要是不是某些组织和个人的努力的结果呢？恐怕不是。比方说，第一个十年的时候，新工人数量已经不小，而且劳工组织实际上早已经建设起来，可是，就没有什么大的斗争形势。到了第二个十年，还是新工人，还是这些老的劳工组织，但是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个变化，我想有两个大的历史原因。

一个是，在初步解决掉国企和老工人之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迎来了一个相对长期的繁荣时期。虽然受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但是中国资产阶级运用更快更大的资本积累，来缓解了国内的经济问题。这种高速的资本积累，快速消耗了之前处于产业后备军范围的失业半失业人口以及农村劳动力，以至于在第一个十年快结束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劳工荒”的问题。从绝对数量上，当然中国不缺工人，但是相对于当时的资本积累的速度，资产阶级不得不提高工资和其他待遇，来确保充足的劳动供应。

再一个，在过去十年时间里面，资产阶级，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一度放松了对新工人的统治。不管是“和谐社会”的口号，还是劳动合同法的实行，对官方工会的反思和改革，也包括对于集体谈判的鼓励，以及对于各色合法半合法状态的劳工社会组织的容忍，都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气氛。广东一带的政府，实际上希望这些劳工社会组织来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作用，即在有劳动纠纷的时候，帮助工人把意见引导到集体谈判和劳动仲裁的方案上来，而不是走到有政治意识的阶级斗争那里去。

所以总的来说，资产阶级对新工人在经济上妥协，政治上让步，是第二个十年的主要特点。熟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同志们，大多知道所谓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说法。这个黄金年代出现在二战后的西欧和美国等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持续了大概 20 多年，其特点就是资本高速积累，工会力量发展，工人待遇改善，换句话说就是劳资两利。

事实上，在中国，尤其在广东等地，在过去十年里，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重现了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这一切的基础，自然是第二个十年里面资本的高速积累。正是资本的高速积累，推动了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工人工资谈判能力的提高，而也正是为了保持这样的高速积累，资产阶级愿意在政治上进行一系列的让步。

这样的黄金年代，也包括了左翼的学生社团。在第一个十年里，虽然左翼社团也存在于部分高校，但是其规模和影响力都还远远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更多的是作为老工

人斗争的记录者和帮手存在，是工人阶级的学生。到了第二个十年，左翼社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大批学校都发展起来，在校园里可以举办各种左翼活动和讲座，这不是说没有打压，但是跟现在比起来是相当宽松的。左翼社团也有了能力对新工人的斗争进行干预，他们不再单纯是学生，而是更多的期望获得先锋队的地位。

这个黄金年代，带来了诸多斗争的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想象。比如右派的工业党说中国可以就此赶超强大下去了，左派的这些同志觉得资本主义合法斗争手段是相当灵的，社团-社会组织-工会，似乎是一条走得通的路。这自然而然的，也恐怕让很多人觉得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黄金年代社会斗争曾经出现的手段，也是好用的（比如签名请愿，举牌抗议，电话轰炸等等西方群众常用的方法在今年不断的出现，就是直接的证据）。

黄金年代也就是之前说到的这种革命路线的物质基础，而黄金年代的物质基础，又是中国资本的高速积累。不过，从过去几年开始，中国资本积累已经大幅度放慢，地主家也摆出一副没有余粮的样子，黄金年代已经垮掉了，以及支撑黄金年代的妥协让步政策也要被否定。

从经济上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形势不好。沿海地区资本积累的放慢是肉眼可见的。拿广东来说，从2008年到2015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25，而从2015到2017年，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只增长百分之8，这个速度不算低，但是跟之前比起来已经是一个剧烈的下跌。与之对应的还有工人的工作，就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广东的制造业城镇单位的岗位少了快100万个，这些城镇单位岗位是相对正规的经济部门，无疑这些工人必须从待遇更坏的部门去谋生，或者离开广东。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劳动份额的上升也放慢了，2011年到2013年，劳动份额每年能上升1.9个百分点，在2013年到2016年之间，每年只能上升0.3个百分点了。

随着资本积累的放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再做出妥协，政治上也是一样。在 2016 年，广东就进行了几次臭名昭著的抓捕，把长期在劳工组织工作的活动家曾飞洋等以莫须有的“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判刑，同时还抓了长期进行工人斗争信息整理发布工作的卢昱宇与李婷玉。实际上，这本身就否定了资产阶级自己在第二个十年里面一度对劳工组织采取的容忍态度，应该说其政治信号是明确的。新工人为主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也陷入了低谷，一方面是，2014 年以来，大规模的有影响的斗争基本没有了，另一方面，就连工人罢工的绝对数量也出现了下滑。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数字，2016 年比起 2015 年略有下降，而 2017 年中国工人斗争的数量比 2016 年下滑了一半还多，到了 2018 年才有了一定回升，但还没恢复 2015 年的水平。

说到底，黄金年代已经在急速消退，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拿出了新的姿态，广东的新工人在各方面处于相对消沉保守的状况。在这种时候，如果活动家拿出在黄金年代都不一定能适用的一些目标和手段，就免不了要吃大亏，事实上也的确是吃了大亏。

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对于青年左翼的镇压，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整体态度的变化。资本积累大幅度放慢，资产阶级放弃了之前的一些妥协姿态，这里面就包括了对劳工社会组织和校园组织的打压。黄金年代没了，建筑在其基础上的革命路线，也就更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广东新工人为中心的革命路线，曾经一度能有一些成果，但是现在就成了死胡同的原因。

下一个十年怎么办？

树挪死，人挪活，刻舟求剑既然行不通，革命者就应该去摸索新的路子。我们有必要全面的反思过去那条“流行”路线的两个理论基础。首先，广东不会是革命中心。事实上，过去以广东新工人为中心的路线，就是标准的硬碰硬，专门找资产阶级最强大最有社会基础的地方攻击，除了在过去十年的特殊的条件下，这样的举动是事倍功半的，更不要说，现在随着黄金年代的消失，原有的一点特殊条件也没有了。

其次，革命没有法定程序，也没有可能走所谓独立工会道路。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独立工会这样的东西，在历史上，工会要么是跟着资产阶级政党的，要么是跟着各种革命党的，从来都是政治性的，单纯的事务性的集体谈判组织（所谓独立工会）只存在于幻想中。事实上，工会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黄金年代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黄金年代之后，在整个世界上都大大衰退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已经没有黄金年代条件的中国，工会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这一点在 2018 年初的一篇红色中国网的短文《当代中国工人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中有更详细论述，这里先不多说。

一条反资本主义的路线能不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行，取决于这个路线能不能踩在敌人的软肋上，这就需要对中国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整体的分析。

中国资产阶级的软肋在哪里？红色中国网工作组的建议书里面已经进行了论述。总体来说，就是到广阔的中西部去，到有三线工业基础的地方。在这些地方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而有着政治上最先进的老工人队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大量资本逐渐转移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的来自本乡本土的新工人数量也在大量增加，而且很多都跟老工人有血肉联系。所以老工人，以及在这些资本主义企业里面工作的工二代，三代和其他新工人，可以实现紧密的合作斗争。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能可以看到一个前所未有般强大的工人阶级，而面对的是一个相对较弱的资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新高潮是指日可待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研究学习在广阔的三线地区老工人和新工人的斗争经验，同时要积极探索老工人和新工人有机结合的路子。工人斗争的具体形式是开放的，只要不要带着某些类似“工会“之类的本本框框去硬套，相信在几年之内就能有些成果。

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开始了。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河南，陕西，湖北，重庆等中西部的工人罢工数量已经追上，超过了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市，这个大趋势，我相信会持续下去。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危机趋势逐渐加深，这种斗争中心的转移，呼唤着革命者，尤其是青年人，把历史的任务接过来。经受住这一次严峻考验的同志们，在反思整个革命路线之后，会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中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第二个十年末尾进行的这种反思和考验，是资产阶级现在给我们的一份最重要的礼物。

深圳佳士工人维权的两大意义

潘毅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8年8月17日）



2018年7月，上市公司深圳佳士科技的员工要求自主筹建合法工会，却遭资方、上级工会和警察打压。30名工友与学生被拘捕，引发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随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和毛左人士亲赴深圳坪山现场声援被捕工友，这不仅加强了对当局的施压，也带动了对事件性质和未来走向等问题的争论。

在笔者看来，是次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并非个别激进工人和学生的非理性行为，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第一，它开启了工人阶级自觉组建工会的运动；第二，它代表工人和学生等社会中坚力量对中国未来该往何处去的全新探索。一方面，佳士工友要求自主筹建工会，这是一项体现工人阶级觉悟的政治诉求。从5月中旬开始，工友向坪山区总工会反映恶劣的劳动状况，寻求自主组建工会。厂方不但阻挠工会选举，还将提出诉求的工人开除，进一步激化矛盾，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自主筹建工会抗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成为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一员。这一进程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而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

缔造了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2017年，中国共计有2.8亿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劳资矛盾不断加深的四十年。近年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GDP增速跌破7%。最近半年的中美贸易战硝烟正浓，制造业必将受到冲击带动工资与福利下降，直接影响工人生计，中国的劳资矛盾必将愈演愈烈。

据统计，从2010年开始，中国每年的罢工数量都会“翻一番”，珠三角就是其中一个多发区域。工人的抗争对象多为资方，诉求则主要集中在追讨欠薪、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工伤赔偿、搬厂安置和赔偿等方面。这些诉求直接关乎工人当下的切身经济利益，是工人在遇到威胁他们基本生存的劳资纠纷而诉诸法律渠道又无效后，自发采取的反抗。

经受过多次经济斗争洗礼的中国工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自己的组织，这些反抗要么无法取得胜利，要么无法守住抗争的果实。所以这一次佳士工友要求自主筹建工会，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的非理性行为，而是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和中国工人多年抗争后的必然结果。佳士工友的行动也说明，中国工人已经从单纯的经济主体，转变为具有阶级觉悟的政治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已经开启了中国工运的全新篇章。

左倾成为潮流

另一方面，这次佳士维权事件发端于工友的自发斗争，但随后得到全国进步学生和左派人士在线上和线下的支持。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就业难、薪资低、工作时间长、生活成本高企、阶级固化严重等问题造成青年贫穷愈演愈烈。中国的年轻人因此迫切地想知道，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自己的困境？他们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所以，即使舆论管控越来越严格，也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主动关心社会不公与劳工权益问题。批判资本主义思潮，尤其是强调劳动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为当下中国年轻人提供了符合切身经验的解释。因此，左倾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成为一股与日俱增的潮流。

在这些左倾青年中，不乏遍布全国的在读大学生。当前正值暑假，有一群学生正在工业区进行法律教育的社会实践，恰巧遇上佳士工友的行动和目击警察的违法行径，将自己的见闻发布到网上。

更多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持续密切关注事件发展。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超过 50 个知名高校的学生，亲赴深圳坪山的事件现场声援被捕人士。他们在佳士工厂和当地公检法机关门口手举毛泽东肖像，高唱红歌，高喊释放被捕工友和声援人员的口号。而部分佳士被捕工友，在取保候审之后，主动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在看守所的遭遇、为何信仰毛泽东思想、为何要参与和声援此次自主筹建工会的行动。

此情此景，不难让人联想到 1968 年 5 月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运动。两场运动同样是在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之下，同样出现学生和工人互相联结。在"红五月"中，法国学生也抬出毛泽东像，高呼毛泽东的语录。50 年前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都出现相似的情景，足见这些进步学生并非是被某种意识形态绑架或煽动，而是从相似的现实条件出发，在相似的历史和理论资源中吸收养分，再转化为行动，照亮未来。

佳士事件看起来事发突然，但它反映的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学生和工人作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都在此次佳士事件中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自觉。年轻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历史中获得理论和实践资源，也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该往何处去"这一问题身体力行的探索。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或许没有亲身体会过社会主义的挫折，但他们确实正在经历着资本主义的危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日益深重，工人和学生们的政治自觉将愈发高涨。

中国社会出现了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灵感。无数像佳士建会工友的劳动者，和像左翼学生这样的行动者，正在给出他们的答案。

一方面，他们在左翼的理论和历史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也期待他们在吸取社会主义挫败的历史教训下走得更远，更有希望。

（本文不代表 BBC 观点）

井冈山今何在？——论佳士工人斗争与革命复兴的前景

洛崇（2018年8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茫然四顾，井冈山在哪里？

井冈山就在佳士、日弘、富士康中，就在东莞、昆山等一切工业区的工厂中。

梦雨同志和日弘厂工友的维权斗争是由自发向自觉斗争的转折点。

长久以来广州深圳众多公司都存在恶意欠缴、少缴公积金的情况。今年6月深圳富士康员工便发出公开信，要求按全额工资缴纳公积金，此前富士康一直是按照最低标准执行的，每月仅仅缴纳底薪的5%。欠缴公积金涉及13万工人，27名富士康工友发布了联名信要求补缴住房公积金。而富士康一直不予回应。

往前回溯5-10年，2009年1月19日广州越秀区约500名环卫工人发起罢工，提出诉求要提高工资，补缴未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此后的2013年，2015年合计有上千工友提交了投诉信。

日弘厂与黑中介，在2018年1月份以前，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劳务人员依法缴纳过一分钱的住房公积金。梦雨同志是以微信投票选举的形式选出的工人代表，她以代表身份提出加薪方案，尝试依靠基层工会进行民主斗争，公司百般刁难，工会虚与委蛇，梦雨同志遭到报复性开除，而基层工会的工会主席僭用工会名义撤销梦雨的协商代表资格。

所以围绕着此后的仲裁，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也是涉及基层工会民主的政治斗争。

佳士厂制定严苛的罚款制度，号称“佳士十八禁”，肆意搜刮，同时和日弘一样不为劳务人员缴纳住房公积金。因为资方长期恶劣对待工人，工人向区总工会反映情况。区总工会表示可以组建工会。资方自行组建了“职工代表大会”，完全排斥工人，同时针对工人代表刘鹏华采取了殴打和调岗，警方无视伤情，反而把刘鹏华拘留起来，到凌晨才放出来。

代表的被拘留，并没有使工人惧怕，反而激发了工人斗志。7月21日，20多位工人去派出所要求放人，全部被拘留24小时。出来之后，工人们越挫越勇，越聚越多，与7月22日，再次到派出所讨说法！

工人代表是工人利益与诉求的核心体现。佳士厂的斗争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斗争了，而是涉及工人组建基层工会的政治斗争——这些事情正在产生叠加效应。

如果说，佳士厂少数先进工人代表的出现，不足以说明整个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的觉醒。那么后续的不屈不挠与警察对峙、成熟的战略策略、严密的组织、主动而广泛地利用社会资源种种，就不能不说，这的确是中国东南沿海工人觉醒的典范。

和以往我们能够看到的国企老工人、参与工运的知识分子不同，我们这次看到了刘鹏华、米久平这样勇敢坚定、群众面广的工人领袖，而且这些工人领袖绝不孤立，他们身边机密团结着本厂工人、地区工人，甚至当地热心人民群众都积极声援支持！

2013年以来发生较大影响的工人斗争有迪信通工人护厂斗争、先进微电子工人罢工、深圳盐田港工人罢工、东莞诺基亚工人罢工、欧姆工人罢免工会斗争、广汽江森工人罢工、裕元鞋厂大罢工、胜美达工人建立工会斗争、哥士比鞋厂罢工等等。各场斗争参与工人的人数从几百到几千甚至几万。而斗争的诉求也日益升级，从反搬厂到争加薪、从要求补偿社保到要求建立自主工会。工人群众的组织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一些斗争中已经形成了较严密的组织。工人斗争也已逐步突破一厂的狭小范围，而在一些斗争中、保护工人代表就

成为重中之重，例如声援迪威信工人代表吴贵军，声援裕元罢工的劳工 NGO 活动分子等等。

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时至今日，我们都很清楚，那个应当葬入坟墓的反动集团在哪里。当今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已达四亿左右，占劳动者多数，其中有约两亿产业工人阶级。现在中国产业工人占人口比重是沙俄的将近 7 倍。当代工人阶级所能起到的作用是过去新民主主义时代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总和。那么当今拒绝、质疑、忽视“到工人中去”，不把到“工人中去”作为战略中心任务的“左翼”，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不愿到农村去发动农民革命、不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中国的左翼，共产主义者，马列毛主义者的复兴，从 1996 年“中国与世界”网站的创立算起，到“时代先锋”的横空出世现在有 20 多年了，期间有各色各样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而都有如杯水风暴般浅尝辄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脱离了工人阶级。因为我们脱离了工人阶级，所以就会什么产生各种小粉红似的奇思妙想，最天真烂漫的莫过于“保党救国”论。历史会发问：这是什么党，这是什么国？现在结论已经清楚了：时代先锋就是中国青年的方向，也是整个中国左翼实现革命复兴的方向。

青年学生，与其毕业后当一个庸庸碌碌的小职员被“主流”社会同化、或者成为所谓“左翼宅男（只在网上进行“左翼活动”、现实中却是无法融入社会的边缘人），还不如到工厂的广阔天地去锻炼自己，使自己在工人阶级的大熔炉中脱胎换骨，成长为坚定的、强大的工人阶级战士。工人阶级在长年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造就了勤劳勇敢、朴实善良、团结互助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这是作为历史的真正动力的高贵品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也是革命的力量源泉。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专政要能建立并巩固，不能认为只靠杰出的革命领袖、政治家、军事家等“大人物”就行了，而恰恰需要千百万扎根于群众之中的基层革命者、特别是革命工人作为基础，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是无本之末，无源之水。

列宁在《怎么办》中曾经赞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艺术：

“在德国，没有一次政治事件不是使社会民主党的威信和声望愈来愈高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总是走在大家的前面，用最革命的态度来估计这种事件，支持一切对专横暴虐的抗议。它不用所谓经济斗争一定会使工人碰到他们无权的问题，具体条件必然推动工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等等的议论来安慰自己。它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问题，例如关于威廉不批准资产阶级进步党人当市长的问題（我们的“经济派”还没有来得及开导德国人，说这其实就是同自由主义妥协！），关于颁布法令禁止“淫秽”书籍和画册的问题，关于政府对教授人选施加影响的问题以及其他等等问题。他们处处都走在大家的前面，在一切阶级中间激发政治上的不满，唤醒沉睡者，鼓励落后者，提供各方面的材料来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积极性。结果，甚至那些社会主义的死敌也不得不对这个先进的政治战士深表敬意；因而，不仅是资产阶级方面的重要文件，甚至官僚和宫廷方面的重要文件，不知怎么也往往会奇迹般地落到《前进报》编辑部的手里。”

一方面是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一方面是我们切实地“到工人中去”，一方面是中国青年摆脱庸人爬虫的世俗枷锁，一方面是马列毛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我们可以肯定：

最伟大的诗人所预言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马上就会到来!!

要奋斗，就要有牺牲

远航一号（2018年8月26日）

8月24日，深圳当局出动大批防暴警察，拘捕学生和工人积极分子六十人。此前，已有十四名工人和工人维权积极分子沈梦雨身陷囹圄。自今年5月开始的佳士工人反抗资本家欺压虐待并争取筹建自主工会的斗争，及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分子支持佳士工人正义斗争的声援行动，至此告一段落。

在这次斗争中，全国各地和海外以各种方式表示支持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共产党员有数千人。在前线长期坚持的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经常有几十人。在过去一个月中，佳士工人声援团转战深圳、惠州、广州等地，在珠三角地区广泛地宣传了马列毛主义、宣传了新一代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国际资产阶级主流报纸对这一事件在不同程度上做了报道。

自1989年以来，在相当一个时期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不觉悟的状态；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本世纪初，由于部分小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分裂，马列毛左派初步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2009年通钢工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马列毛左派完全取得了对老工人斗争的领导权。但是，一直到不久以前，新工人争取经济权益的斗争和小资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包括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作为小资产阶级右派的自由派手中。

在过去一年中，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包括佳士工人斗争的最近几次重大斗争中，无论是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还是争取工人经济权益的斗争，马列毛左派都取得了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一部分自由派朋友参与了这些斗争，但是他们的参与恰恰证明了而不是违背了马列毛左派的领导作用。仅从这一点来说，这次佳士工人斗争，无论其直接结果为何，都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遭遇了历史性的失败。这种失败，就政治上来说，是因为中国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结盟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但是，资

产阶级昨天的胜利正在为它明天的失败准备着条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残酷剥削无产阶级，而且还压迫小资产阶级，这就把小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靠拢，正在为无产阶级在将来的胜利铺平道路。这便是历史的辩证法。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事物的本质来说，佳士工人与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分子所领导的此次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远大征程的一部分。就这次斗争本身来说，没有实现斗争初期的目标。在今后一个时期，各地工人和学生反压迫和反剥削的斗争将面临更加困难和严峻的局面。

此次斗争的失利，从反面证明了，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的整个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反剥削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反抗资本家和官僚具体欺压行为的经济斗争。在反复的经济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将得到不断的提高。但是，劳动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本身不能代替为了某一次具体斗争的胜利而必须具备的现实条件。这次佳士工人斗争的失利说明，那种依靠发动全国左派力量声援和现场示威来壮大声势的办法，是代替不了现时现地阶级力量对比的。这一办法，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当各方面条件确实有利时，才可以偶然使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斗争的胜利主要应当依靠当地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自身的组织力量，要靠无产阶级在现实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优秀分子自己来发动群众、团结群众、领导群众。以往一些斗争的胜利都是这样。

目前，除部分被捕学生被遣返以外，在佳士工人斗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一批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仍然被关押在资产阶级的监狱中，其中一些同志可能被判刑，可能要在监狱中进行较长时间的斗争。毫无疑问，在监狱中，这些同志将蒙受肉体上的折磨和精神上的凌辱。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奋斗，就要有牺牲，干革命，哪里有不吃苦的。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谭嗣同就有豪言壮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

今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再一次翻身做主人，胜利果实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必须经过一个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过程。工人代表尚杨雪说得好：“只是为了想堂堂正正地站起来做一回人！”自从有阶级社会以来，剥削阶级从来是不允许劳动人民站起来做人的。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最害怕中国的无产阶级重新站起来。为了压迫无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为了恐吓正在向无产阶级靠拢的学生积极分子，他们有什么本事呢？无非是开除学籍、上黑名单、封网封号、抓捕判刑。

对于这样的困难，我们的工人和学生积极分子早在被捕之前就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挑战，也接受自己的阶级队伍对自己的考验。如果说，在进监狱以前，还曾经有人有动摇、有幻想，那么，资产阶级的监狱便是无产者最好的学校和训练营。凡是从这所训练营毕业的，都将是经过钢铁锤炼的战士和矢志不渝的先锋队员。

让资产阶级的警察和打手尽情地表演他们的卑鄙手段吧。想要堂堂正正做人的亿万中国劳动者是决不会长时期屈服的。这是陈胜吴广的国度！这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归根结底，你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我们将埋葬你们！

佳士运动的争论与反思

青年先锋（2018年12月）

一、佳士运动失败了吗？

在佳士运动接连遭受挫折的今天，我们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学生与工人相结合的运动在起点上就栽倒了。但是，在 11·9 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反思运动是非常必要的了。反思不是居高临下地指责运动的不成熟与策略的不完善。一些左翼内部的批评声音不仅不是建设性的，甚至反而质疑运动本身的合理性，暴力镇压后，现在更是寒蝉般噤声。指责运动脱离了佳士工厂的普通工人，缺乏工人基础是最主要、也最严厉的批评声音，例如质疑工人积极分子不扎根工厂发展工人、运动在工厂外展开、学生取代工人成为抗争主体等等。这些声音不仅对运动中的积极工人和学生不公平，而且对于中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本身抱持着过于苛刻的要求与期待。

运动是有必然性的，这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形成、工人阶级与资本-国家联合体的对立决定的。一次运动却是有偶然性的。佳士工厂的几名工人在已经被资方遣散出厂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大门外抗争；在积极工人和声援群众被捕后，左翼学生只能选择到当地政府抗议。运动的发展过程并不能预先被设计。在运动的现场，积极工人和声援学生做决定和动员的时间并不是无限的。工人代表和左翼声援学生只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决定，是继续还是放弃运动？在这样的情境下，指责运动缺乏工人基础就是在指责他们发动了运动本身。

反思运动也不是单方面地指责运动中策略的疏漏。特别是在中国的工人运动经验还不丰富、积极分子和左翼学生整体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运动中的策略失误是在所难免的。可以做事后检讨与策略改善的地方有很多，例如运动中网络舆论的宣传、冲击警察局等过于激进的行动等都值得改善。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的是，检讨与策略的讨论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回头看不是为了瞻前顾后、畏缩不前，而是为了再出发。

所以，运动的反思首要的问题是，怎样的反思有助于服务当下与未来的运动？当下左翼内很多批评的声音或许过于纠结运动中的种种细节，结果是反思走错了方向。在当下工人阶级的行动意识刚萌芽、运动在国家与资本的打击下总是羸弱的背景下，我们最应该反思的问题不是被抓捕的工人、现场的学生到底有哪些对与错。我们最应该反思的是，在这场运动中，泛左翼的关注者们为什么没有迅速地团结起来为运动提供支持，反而在围观、在围观中滋生了分歧、在分歧中出现了太多无益于运动的争论与批评？

左翼内部的争论中，所谓的宗派之分、路线之争占据了很大空间。但是，我们其实不必进入这些争论的细节。这些争论白白消耗了运动中的很多精力，反而影响了左翼的团结。如果说策略之争还有其现实意义，所谓的路线之争完全不属于现在的问题。恰恰相反，以路线之争来指导策略之争，反而先杜绝了左翼内部分分析与对话的可能性。

宗派主义、路线之争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争论。我们要用运动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运动。从运动的视角来看，即使有理念之争，左翼当前的运动议程应该是一致的，从总体上支持工人组建工会，到每个事件中声援工人与学生、营救被捕工人与民运人士，分析与对话是为了服务共同的运动。

所以，在佳士运动接连遭遇挫折之际，反思的重点更应该放在泛左翼的力量该如何支持当下和未来的运动。为什么除了学生以外，现场和媒体上站出来的左翼人士还不够多？媒体和网络上的声援和宣传工作，是否充分发挥了我们传播的能力？除此之外，表达支持的方式还可以有哪些探索与尝试？在国内局势过于紧张的当下，海外的左翼学生和热心人士能够为营救工作做哪些贡献？

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还有时间从长计议。在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中，减少对工人和学生的伤害，是所有泛左翼和热心人士的共同期望。但是只反思这一次运动里声援学生哪些地方做错了是不解决问题的。一个完美的运动策略也不能带来大团圆的结局。工人运动是阶级力量的发展与对立决定的，运动中的冲突也是如此。想象一个靠策略来避免国家和资本的破坏与打压的运动是不现实的、过于天真的。

只有认清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认清了工人阶级和资本以及常常与资本联合的国家之间的根本对立，才能真正反思佳士抗争的过程与得失。因为当下的运动，必须放在前面两部分的背景下来理解。

二、佳士工人的斗争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有一种主要的批评，认为佳士工人的斗争与声援团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是过激的、脱离实际的、脱离工人群众的；进而认为佳士事件被谋求光环的“政客”所主导，制造政治明星，用博眼球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取代了切实的工人运动；由此过早暴露了学生社团的体系网络，招致了当局严酷的打压，参与的工人与学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实质上是被利用和坑害了。从这种批评的视角出发，那么整个佳士事件的行动都是不应该参与和支持的，当局11月份的打压更使得一些人加强了这种认识。

这样的认识首先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佳士工人的斗争以及后续的声援，是带着必然性与必要性的。从经济形势发展、工人阶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工人们提出超越经济诉求的制度性诉求——即组建工会——是必然的。

首先，随着标准更高的新一代农民工成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对稳定保障待遇的需要不断提高，工人们对于提高待遇和权利的渴望是愈发强烈的。而工人们越来越发现，要保住争取来的暂时性经济成果，就需要进一步突破资本的束缚，取得生产管理制度上的成果。尽管要求组建工会的直接动因往往是经济动力，但在佳士事件中工人们更为强调的是反对“佳士十八禁”这种不合理的工厂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可以随时给敢于争取经济利益的工人“穿小鞋”。就像沃尔玛的“综合工时制”可以被用来随意调班，整治不听话的员工一样。而要反对这种管理制度，相对长期有效的途径就是组建工会来表达诉求。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早已进入了转折期，是否能延续稳定增长取决于能否找到新的持续的经济增长点，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中国能否在高端产业领域的争夺中占据足够的位置。如今的中美贸易战就是这种争夺的一次体现，这种争夺可能难以一次决出胜负，但不论如何长期来看始终会分出强弱。强势一方的社会矛盾将有一部分被转移到弱势的国家，但其本国的经济斗争、组建工会的斗争也可以由此具有更大的空间——争取工会并不等同于改

良主义，这反而有助于在危机时避免群众听信繁荣时有用的改良主义。至于竞争失败的国家，阶级矛盾将会被激化，政治性的工人斗争将更容易被动员起来，组建工会无疑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步。

最后，随着外围国家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被纳入雇佣劳动者之中，原本的廉价劳动力会逐渐提升其价格，原先因为劳动力需求不足而彼此激烈竞争的工人转而要求工会的可能性也会逐步提升。总而言之，像佳士工人这样要求组建工会的行动，是各种可能趋势所组成的大势之所趋，即使不是在今年提出来，也是迟早、早晚要提出来的。

最大的争议就在于，佳士建会工人的这次行动是不是太早了，太操之过急了？其实，我们不如换一个问法：我们工人什么时候才能尝试去迈过这道——我们刚才证明必然要迈过的——坎儿呢？有人说要等待时机合适，要等待工人的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那所谓一定程度指的到底是多少，不是要通过尝试才能得出的么？难道靠坐在电脑面前感受，就能感受得出来的吗？难道其他人、其他工厂的经验，就一定适用吗？只有靠实实在在的尝试，才能明白机会如何。而在尝试中，事情的进展速度未必是能够主观控制的。建会工人们争取了近九十条签名，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虽然可能没有预想的多，但这是尝试的结果。不幸的是，资方迅速采取行动，与国家机器合作，暴力赶走了建会工人。他们没能动员起足够的厂内力量来支持自己，但是这是一次尝试难免要承担的风险，他们作为有主体性的工人自己选择了去承担，那就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了。并且，从这一刻起，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就从厂内斗争转向了厂外斗争，讨论是否脱离厂内的工人群众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必然要引入社会力量的支持，而其中最积极的就是学生。我们之后会讨论，学生的参与也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

接下来的争议是，工人们是否应该挑战当地警方的力量？以往的工人行动中有对警察力量的挑战，但很多都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取性地要求惩罚偏袒资方殴打工人的警察，这种政治性强烈的行动过于冒进了吧？的确，这个时候行动的风险愈发增加，而积极工人自身和外围支持者的风险估计不足确实值得反思。但是，我们同样要意识到，工人斗争从纯粹的经济斗争逐步上升为带有政治性的斗争，也是运动必然会经过的一条道路。工人要组建工会，就要努力跨过——国家机器（包括上级工会）的妨碍——这道坎。工人的街头行动

不是不可能突破妨碍，不是不可能使国家机器妥协的。但应该进行什么样的行动，只能通过尝试来了解。不尝试是不可能体会到如何突破，因而也就不可能突破的。我们说要评估风险，但评估风险本身也要在不断地试探中得出答案。

当然，当时的评估存在过于乐观的问题，但如果他们已经预料到可能最坏的情况，并且仍然愿意投身其中，那这也是工人们的选择，是他们在富有战斗性的左翼理念下作出的判断，而不是任何人强加的结果。总而言之，要尝试就要冒风险，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尝试，这是斗争者自己的选择，也是必然有人要做出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更好的分析、讨论、评估风险，以及做好传达和应对的工作。后者是这次运动中斗争者需要反思的问题，但是前一个问题更需要在外界旁观的左派进行反思——当有人敢于做出必要的尝试时，是否应该给予必要的支持，是否应该想办法让这种尝试达到更好的效果？如果这方面没有做到，那尝试的失败同样也有旁观者的责任。

工人运动中既需要有人去冲击隐蔽的界限，去尝试可能的手段，同时也需要有人规避高收益、高风险的行动，从事慢工出细活的力量积累。两者之间本就应该相互支持，乃至充分协作，至少不能给彼此造成妨碍。事实上，对工人支持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除了简单的出人出力，联系社会力量，也可以在周围甚至默默地在内部进行宣传，这取决于支持者自己的评估。提出切实的意见和建议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虽然有些斗争者存在着不接受异见的问题，值得去反思，但这种民主讨论的氛围是需要共同去营造的。并且，很多时候通过参与一些基本的支持行动，建立彼此较好的信任关系，也更有利于意见的交流。

三、左翼学生的历史性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7 月 27 日积极工人被抓走之后，学生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学生是否是在某种“非法组织”的利用下，取代了工人，制造了“政治明星”？是否因为过早暴露了社团力量，而沦为了被坑害的角色？

对于“学生取代工人”的问题，我们刚在已经提到过。当积极工人被打击出厂后，短期内再大规模动员厂内工人就缺乏可能了，而想要实现反对工厂、警方打压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动员条件——就不可能不引入社会各界包括学生的参与。“知识分子与

无产阶级相结合”是《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趋势，如果说工人接受了主流的规训不去斗争是自然的，那么工人接受了左翼的观点，发起了斗争，又去结合左翼学生的力量，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学生组成声援团的勇敢斗争是佳士运动里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左翼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与工人的联合、斗争的勇气在运动中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然而在 8·24 声援团被袭击、抓捕不断发生之后，批评的声音反而逐渐压过了鼓励的声音。对学生的检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和积极分子取代了工人的主体性，变成了运动的主角，不仅逐渐脱离了工人运动，甚至还制造出了一些学生运动明星，反而模糊了运动焦点。二是学生们太稚嫩、斗争经验太少，结果暴露了学生社团和工人服务机构的网络，最终导致在 8 月以来直至 11 月 9 日的警察抓捕中，左翼运动力量损失惨重。

进步学生和支持他们的积极分子作为在运动现场的唯一进步力量，反而因为他们的行动力遭到了批评。这样的批评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如前面所说，只有空想家才想象完美的运动，行动者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与动员中做出选择。前事不忘是为了能够给未来的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而不是为了攻击过去的行动者。

无论是左翼内部的阴谋论者，还是官方企图抹黑运动的新闻宣传中，都有一种把学生说成是被利用、被操纵的倾向。阴谋论者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靶子，过早暴露左翼学生的网络成为官方打击的靶子；官方宣传认为学生被操纵成了工具，是境外势力破坏中国社会和谐、甚至颠覆政权的工具。

这样的批评采取的还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进步学生看似严肃，其实非常轻蔑的。因为这两种声音都不相信是学生们可以主动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主动靠近马克思主义、主动为了佳士工人的合法权益采取了行动。否定学生的自主选择，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从根本上否定佳士运动中学生声援团的进步性的想法。在不断的抓捕和舆论攻击反复打击运动之后，这些声音改名换面以后，以检讨运动的名义卷土重来。因为损失太大，所以学生和积极分子不应该暴露得太快；因为要保存自己，所以应该避免正面冲突。从检视运动的得失滑落到取消运动的呼声，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一旦停止对资本和维护资本利益的国家暴力的幻想，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根本不存在完美的运动，因为损失来自于资本和国家暴力的打压，而不是来自于运动者。在一次运动中，我们可以检讨佳士运动冲击警察局太冒进。然而，在对运动的反思中，应该放弃对所谓开明上层的幻想。冲撞警察、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的任务是在运动中学会规避、减少以及承受这样的打压与损失。

所以我们不仅应该看到进步学生们主动选择了投身到运动中，更应该看到学生们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未来的学生骨干从这里开始成长。在这一次佳士声援团的运动过程中，工人中的组织积累不足、运动的宏观计划不足、内部交流不够民主、宣传手段不够新潮等问题都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是在运动中发现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只有运动中才能锻炼。学生是左翼力量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佳士运动锻炼了骨干学生的战斗力，也为学生和工人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榜样。短暂的低潮不能阻挡进步学生天然的正义感和向马克思主义靠近的脚步。

四、左翼运动的成果

在 11·9 抓捕事件和集体检讨运动的悲伤时刻，我们不能忘记运动同样是有成绩的。

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件中，话语权一直是掌握在国家与右派手上的。他们的思想武器是不是国家主义，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在佳士运动中，左翼的行动被更多的人看到了，左翼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了。当市场化带来的阶级冲突与社会不公被更多人看到、被更多人讨论时，市场经济的迷信将会开始被挑战。当更多的青年学生看到了工人的处境、工人为争取工会的努力时，他们对工人维权的理解与同情增加了。左派的主张因而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与共鸣。

然而左派并不会自动掌握话语权，正如同工人也不会自动支持所有的运动。佳士运动表明了工人争取组建工会的必然性。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工人的基础不好，即使有积极工人要求组建工会，还不能树立威信、得到多数工人的信任和支持。所以，很多基层的服务工友、建立信任、组织工友的工作还需要大量投入。佳士运动中真正站出来支持的人数有限，说明还需要培养大量的支持左翼运动的人才。进步学生在佳士运动中的表现给中国左

翼力量指明了一个方向。中国有数千万的大学生，中国的工人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命运紧密相连。在学校中一定可以培养更多的左翼人才。

左翼也应该把握在各种社会事件中发声的机会，和右派抢夺定义中国现实问题的话语权。过去的 20 年，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价值的自由派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发声渠道，建立了市场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左翼更应该加强团结，抛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路线争论，重新将公共讨论聚焦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之上。

此刻我们反思佳士运动，不是为了检讨而检讨，更不应该陷入对过往错误的自怨自艾之中。此时再去幻想可以取消运动中的错误，其实无异于放弃当下的努力。在很多学生已经暴露、11·9 抓捕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反思的方向应该是如何最小化其他的进步学生的风险、如果在最小化风险的基础上开展营救而不是取消运动。

在反思的时刻，我们更需要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与抗争意识的觉醒，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进步学生在运动中得到的磨练与成长，我们的乐观主义来自于每一次反思之后经验与策略的积累。任何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相信，工人与工人的结合、工人与进步知识分子的结合，将会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被捕的工人和学生们，我们内心万分地悲痛，但是我们从悲恸中走出来，接过了火炬，运动将进行下去。

“适应节奏很重要” —— 佳士事件短评

李星（2018年9月16日）

2018年5-7月，深圳市佳士公司的一小批工人尝试组建工会，被厂里陆续开除。7月中旬以来，这些被开除的工人（总计有七八个人）在社会声援者的协助下，在佳士门口多次示威要求上班，一度被附近派出所扣留。7月27日，他们以及多位社会声援者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名刑事拘留。7月底，一些高校学生、社会人士来到深圳，继续开展声援活动，呼吁释放在押人员。对佳士事件的社会关注不断扩大，不乏夸张的溢美之词，比如“这次斗争揭开了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自觉反抗社会压迫的新篇章”[1]。

8月24日，警方抓捕了全体声援人员，予以遣送回家、拘留审讯等等，声援活动告一段落。截至8月底，在押的原佳士工人以及声援人士大部分被保释。9月3日，四名建会工人核心被正式批捕。

佳士公司的一般情况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生产焊机、焊割设备。它在深圳坪山区的工厂有一千左右，其中普工大约600人。2018年，佳士坪山厂普工的底薪是2130元，踩着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线。工厂包住不包吃，生产旺季的加班很多，按照底薪标准为员工缴纳五险（强制）和住房公积金（自愿）[2]。扣除社保公积金、食堂饭费，算上工龄奖、绩效，普工大量加班后的到手工资大致是4600元左右。至于其它的福利，厂方自称宿舍有空调、每年出钱组织旅游，提供打球、K歌场地[3]。

从以上几点来说，佳士厂的待遇在深圳的中小型企业里算是一般：社保方面相对“正规”，福利聊胜于无，工资没有惊喜。另一方面，这家厂最近两年不断提高生产定量，降低人力成本。某员工说，截至今年三月，他每天完成的产量比一年前翻了接近一倍，无形中减少了厂方的加班开支。为了控制成本，老板也在动工人工资的脑筋，搞了不少小动

作。至少在 2016-17 年间，厂里存在较多的调休，把放假时间（包括因物料短缺而放的假）用来冲抵周末以及平时的加班时间，个人请事假要扣双倍工资。某些员工估计，厂里用这套手法可以在每个工人身上节约几百元/月。法定的高温补贴，佳士厂用“按天发放”的计算方法，扣掉了一部分。

为了让员工服从命令听指挥，厂方制订了专门的惩治条例，涉及面广泛，号称《佳士十八禁》，从“不服从工作安排，就无偿辞退”（第三条），到“禁止就餐插队，浪费饭菜”（第十六条），罚款金额为一两百元不等。被惩处的有员工，也有组长[4]。话说回来，据维权工人自己承认，《十八禁》在实践中并没有触及到多数员工[5]。

值得一提的是，佳士的一个特色是“（管理）集体持股”，即资历老的各级管理，包括若干组长，持有公司股票，每年有比较实惠的分红。有的佳士员工分析，这是管理比较卖力贯彻厂方政策的重要原因，而管理层“大干快上”造成的压力，自然要加在产线工人身上。

一小批佳士员工的反抗

至少从 2017 年开始，一些佳士员工开始反抗厂里的压迫。去年 7 月，十几个工人去劳动部门投诉厂里罚款、调休、不给足额高温补贴。这次投诉后，调休变少了，请事假不再扣双倍工资，可是几个带头的工人也让厂里穿了小鞋，很长时间被调去仓库打扫卫生。

今年三四月份，这个小群体继续活跃，有的人去劳动部门投诉“佳士十八禁”，要求退还被罚的款。劳动部门表示，他们检察了工厂并要求整改，厂方也做了不再罚款和限制加班的承诺，至于把罚款退还工人，相关政府人员态度消极。也有人向厂里提意见，反对强迫要求疲惫的员工参与装点门面的“徒步锻炼”。结果，提意见的工人被禁止加班。没过几天，厂里干脆找茬开除了他。

也许，这批热心维权的工人觉得跟厂里耗下去不是办法，今年5月，他们找到当地的上级工会，申请在佳士坪山厂建立工会。表面上，他们的申请得到了工会的支持，厂方高管也貌似欢迎。但工会设了一道门槛，说佳士公司要先提供同意建会的文件，工会才能批复工人的建会请求。事情拖下去了。

今年6月，厂方一手操办了所谓“职工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据工人揭发，选举过程十分儿戏，包括管理直接指定候选人、阻挠得票最多者当选、不当场唱票计票等等舞弊现象[6]。毫不奇怪，参与建会的工人积极分子，统统没有当选代表。

7月上旬，申请建立佳士工会的几位工人开始在宿舍传播《申请加入佳士工会意愿表》，宣传成立工会对工人的好处，很快征集到89个签名。据这几位工人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级工会负责人在电话里的许可。但局势急转直下了。7月中旬，六七位建会的积极分子被陆续以“打架”、“拒绝调岗”等名义开除，区工会也转变态度，与建会工人划清了界限[7]。随后，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一系列事件。

综合上述情况来看，佳士员工对厂里有不满，但没有爆发普遍反抗。一小批员工的抗争行动，包括舆论普遍关注的“建工会”尝试，虽也得到了一些同情，整体上是相当孤立的。当然，在“佳士事件”引发社会反响后，佳士老板与有关部门加强了控制[8]，让工人更加动弹不得。但几个月的时间里，绝大多数工人始终冷眼旁观，是个基本事实。

为什么绝大多数佳士工人保持观望？

稍微了解一点珠三角工人斗争的人，都知道出来打工是为了赚钱，工人在厂里关心的是加班，不会动不动站出来反抗压迫。一位佳士建会工人控诉流水线强度太大：“从早到晚不停做，线上堆货就挨骂。上厕所、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去年线上没人请假（休息），今年没人请假。再这么干，我要垮啦”[9]。但这就是珠三角、全国以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工厂的家常便饭，而工人的主要日常特点就是努力适应环境，专心挣血汗钱。

即使老板使用调休、罚款之类的损招，只要马马虎虎过得去，工人都可以忍。忍不下去的，一般就辞工了。

上文已经指出，佳士的待遇在深圳算中等略偏下，谈不上特别离奇的坏。退一步说，就算碰到特别烂的厂，工人通常也不会选择对抗老板以改善待遇，而是一走了之。简单地说，工人日常的隐忍，来自他身为被统治阶级的整体状态，也来自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制度性服从。这种深刻的被动，不是从旁边“讲道理”、做几个勇敢抗争的示范，就能轻易改变的[10]。

同时，工人不是木头，他只是把对不公平的愤恨埋在心里。到了反抗的时候，他不怕拉出很长的清单[11]。长久以来，“宿舍有臭虫！”、“吃饭加餐”、“宿舍安暖气”等等杂七杂八的抗议要求，经常会在罢工的时候，从珠三角工人嘴里冒出来。

工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可能行动？通常需要有一个大家关心的焦点，也就是集体诉求。十年前的焦点是欠资、减薪、不及时加薪，近些年许多人开始要求搬厂必须有经济补偿金，或者补缴社保。

从经验来看，至今为止，工人行动的带头人，很多时候是基层管理，或者是适应了厂里的节奏、了解厂里各方面情况的老员工。

那么佳士抗争呢？可以初步判断，现阶段佳士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几年来厂里一直没发生过罢工，也是证明。另外，老板用“集体持股”的法子，凝聚了管理层的士气。虽然佳士建厂很久了，但建会工人里，基本没有那种已经“熬出来”的，与管理交过手而能站稳脚跟的老员工。这样一来，少数积极分子也就难以带动更多工人，找准合适的时机发起集体行动。

单独说说“建工会”

珠三角的罢工中，不止一次出现过建立（改选）工会的尝试。有时是作为一个工具，用“再不给钱，我们就要搞组织了！”的姿态，迫使有关部门逼老板让步，以免“事情闹大”。也有过抗争胜利的工人，希望乘胜追击的例子。比如 2010 年本田罢工后的工会选举中，国家和资方花了不小的心思，避免罢工积极分子控制工会。无论如何，依照中国的法律，全总对基层工会拥有绝对的裁决权，而基层工会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自治权[12]。在中国，工会组织对工人斗争的现实价值，还有待探索。

当厂里没有明显的违法、或者长期以来让工人累积怨气的普遍共同诉求（比如近年频繁的搬迁、变更合同/老板、开除老员工等等），工人没有受到特别的刺激，也就是说没有集体行动的背景，建会之举轻易失败是可以预料的。

佳士的这次工人建会，就是如此。虽然建会工人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呼应（体现为 89 人的联署签名），但是当建会受挫时，完全看不到群众行动的迹象。也就是说，被声援舆论看得很重的“佳士工人建工会”，事实上，从头到尾局限为几个积极分子的孤军奋战。

应该指出，带头建会的这几个佳士工人，在厂期间一直比较主动的尝试团结周围同事，鼓励大家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是珠三角大量罢工中，并不多见的一类工人：不局限于一时一事的维权，而是希望推动工人集体的有组织抗争。

从佳士抗争的背景下，看“非典型”工人余浚聪

余浚聪是这批佳士抗争工人的积极成员。他 25 岁，江西人，是家里的长子，已经出来打了好几年的工。他经历过城中村出租房的火灾，他的妻子在佳士因为加班劳累而流产。他为妻子的治疗奔波，发现厂里自动把医保绑定了一家私立医院，转诊很困难。他热心宣传

对工人有用的维权知识[13]，跑过坪山区的各个部门：社保局，劳动局，工会。他把国际歌抄在本子上，在歌词下边划上横线：“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

他干活是勤快的，也懂得有时需要做个向老板低头的姿态[14]。去年夏天他带头去劳动站投诉工厂，被打发去仓库拖地。他没有焦躁，认真工作，几次找到高管沟通解释，最后按厂里要求写了检讨，算是“过关”。

今年四月，他再次因为提意见而触怒了厂里：“调我去清洗胶框、去扫地拖地、以扣绩效威胁身边的同事不准跟我说话，想尽办法逼我走” [15] 他“坚守阵地”，但是周围的人跟不上他的节奏。小余苦恼地写道：“更痛苦的是一些工友也接受了厂方的宣传，说我故意闹事，神经病…… 厂里的同事多已成家立业，不敢担风险……” [16] 小余的抱怨发自内心，但很片面。事实上，无论是否“成家立业”，对珠三角工人来说，这么多年来罢工就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开始罢工……

确实，小余不像一个“正常”的珠三角工人。“很多同事问我，厂里这样逼你呆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去找份更好的工作，再说你是耗不过厂里的！” [17]

对类似这样的、来自“正常工人”的好言相劝，他倔强地回答：“有很多人说反抗没用，实际上呢？去年去劳动局投诉之后，佳士事假还敢扣双倍吗？调休还敢那么频繁吗？” [18]

今年五月他被老板开除。然后他继续积极参与建会工人的抗议活动，直到被关押。在抗议期间，在一次街头宣传时，他说到：

我们在厂打工的，在外上班的都知道，我们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我们就拿这点钱，老板还要给我们七扣八扣的。我们产量连倍地上涨，他们还是要控制我们的加班。没有工资，

我们怎么养活我们的家人和小孩？没有工资，我们怎么在深圳生存下去？我们就想加一点工资，把违法调休违法的罚款要回来，找到劳动局，劳动局不为我们说话。相反，老板还要说我们是闹事！说我们是别有用心！……他一个人，拥有几亿几亿的资产，几十亿的资产，我们，从年头干到年尾，只能拿到两三万块钱。我们加点工资，要回我们的罚款，有什么错？

这段话，是一个工人理直气壮的不平之声，没有刻意煽情，没有鹦鹉学舌，没有多余的粉饰。

近一个多月来，知情人陆续披露了小于、建会骨干小刘、小米等人的以往抗争史，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批“非典型”工人的行动思路。

小余与“春哥”：厂内日常抗争方法的简略对比

在这批佳士工人断断续续抗争的一年多时间里，厂方的猎犬鼻子似乎闻到了什么异味。今年四月，佳士人资部门对外声称“我司碰到四个特别难搞的员工，去年同一时期入厂的。总是故意制造事端”云云。

从已知的信息来看，本次佳士抗争以及声援中起到核心作用的某些工人，不管是在职/离职的佳士员工也好，外厂员工也好，大多有过在其它工厂挑头争取权益的实践，包括但不限于：举报厂里的加班费不合法、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强制加班或义务加班，向厂方要求为派遣工补缴公积金、派遣工与正式工同工同酬，并定期转正，等等。据知情人透露，这些工人经常因此被厂里开除或当作“瘟神”给点离职补偿打发走 [19]。

时间长了，他们要在厂里扎根，恐怕就越来越难了。一位有类似经历的佳士离职工人，本次抗争的声援者回忆说，有过维权经验的某外厂工伤工人告诉他，坪山区部分企业有个员

工黑名单，不仅企业互通情报，人资局和劳动办也很清楚，并提醒他：“你到处这样搞（抗争），估计也会被（黑名单）录上去。他们的定义是‘专门闹事讹诈’，还说要叫名单上的所有人在坪山找不到工作。” [20] 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更谈不上协助工人团结抗争了。

与这批“勇敢冲锋”的佳士工人相比，某些有反抗意识，但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珠三角工人，面对劳资纠纷，他们也会鼓动工人，也会主动示范，但在进退时机的把握上，在“气候”的观察上，有明显的不同。

有一位外出打工近三十年的老员工“春哥”，比较敢于向厂方争取工人利益，摸索出了一些门道。他在深圳某港资油漆厂仓库部门上班期间，周围同事对厂里积累了不少怨气。

“春哥”顺应大家的情绪，因势利导，积极参与了多起劳资纠纷。有一次，上百个仓库员工发现年终奖发少了，他鼓动大家：“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不合理，同时还干活，那厂里还跟你谈什么？肯定不谈啦。”当罢工开始以后，针对管理声称“老板不在”的拖延战术，他跟其他几个出头的工友表示：“你们又全权，又没权，没必要跟你们谈。”最后厂里决定补半个月给他们，“春哥”并不满意，但看到大家都复工了，他也没有硬出头拦下来，因为拦也无用。

事后，人事部门试探春哥是否是“带头的”，他不与对方纠缠，而是给了一点警告：“你有证据吗？如果有证据，可以立马炒掉我。如果没有证据，我劝你不要随便说”。

当仓库部门发现厂里克扣特岗津贴时，“春哥”直接打电话质问总经理，迫使部门经理恢复了大家的特岗津贴。他这样解释为何大家都缩头，仍然需要争取集体的利益：“虽然我们对厂里都没有信任感，但其他人只是口头发牢骚，不会轻易行动。他们说‘上面要扣掉，争也没用’。只有我跑去给总经理打电话。但如果只补我，不补其他工友，他们又会有情绪的。” [21]

就这样，“春哥”在日常抗争中，努力给大家传递一个信号：“已有的利益要争取，没有的利益也要争取。一切皆有可能！”同时注意把握分寸，让厂里觉得他终归表达了同事们的真实态度，而不是一个与多数人想法不同，专门捣蛋的“破坏分子”。

综合已有的信息，佳士抗争的核心工人小余、小刘、小米等人，在这家厂的工作时间顶多两年，虽然动了脑筋去结识同事（包括积极参与厂方主办的活动，让大家了解自己[22]），在带动工友一起抗争的节奏把握上，相比“春哥”，显得有些不顾环境、急于求成了。

从种种迹象来看，小余以及其他被开除的佳士工人，他们与资方围绕“开除-复职”的冲突，相比之前双方的举报-报复风波，更加超出了珠三角劳资纠纷的常态。不带感情色彩地说，很显然，这批工人不想按普通维权工人的惯用思路去解决“非法开除”的问题，也就是常见的“老板，赔钱！”（或者满足其它物质要求），而是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准备把冲突本身延续下去，让它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23]。

那么，小余以及其他几个类似的佳士工人，他们在厂里搞维权，除了维护直接受损的员工利益，是否还有其它的目标？比如，是不是想通过示范，激励其他工人效仿？当自下而上建工会明显机会渺茫时，他们仍要坚持，是否真实的目标在于“搞个大事件”，拔苗助长式地提升当前工人抗争的水平？这些疑问，都还有待进一步澄清。

不排除一种可能：佳士抗争，尤其是“建会”-声讨派出所-社会声援等几个环节，是一些急于看到“石破天惊”效果的年轻工人，在某些左翼主张的影响下，人为炮制的“宣传队”行动[24]，尽管对参与其中的工人来说，对工厂、老板的愤恨和斗争欲望都是真实的。

适应节奏很重要……

假如一个工人还没来得及适应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节奏，就急于在厂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很容易有受挫感。对小余这种年纪轻轻，已经在厂里摸爬滚打惯了的人，“适应节奏”的问题不大，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带动工人”的思路问题。但即使在佳士抗争工人的范围里，也不是所有人都很容易“适应节奏”的。

在 7 月 24 日的佳士厂门抗议期间，一位佳士离职女工也参与了声援。她的发言值得玩味。她提到自己的工位需要用刀具，线上的所有同事“手肯定受伤，不止一次，受伤肯定流血，不止一次”。她提到车间提供小药品，其中的创可贴总是最早用光的。她说到自己想借着这事唤起同事的反抗思想，但是她们只想赶紧做完货，可以下班。她发现自己在车间里对某些物料过敏，本想提醒大家注意，其他女工却说：“很正常，所有人身上都会起泡泡，都会过敏”，让她哭笑不得……在发言中，她也提到老板的无限权力，“想让你加班你就得加，想让你放假你就得放假”，而对身边的工人，越来越感到“很难团结她们，她们不理解，不接受……没有希望的感觉。”她试过抗议厂方的管理，也像小余一样被穿了小鞋。她身心俱瘁，进厂一年以后，只好辞工……

无论是谁，想在厂里“组织工人反抗老板”，必须要学会的，恐怕是“耐心”。所谓耐心，主要不是指私人品质，而是适应工厂的资本主义生产节奏，适应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生存节奏，把握这个阶级奋起与静默背后的动力变化，与它在解放的道路上一起前进。

隐藏的阶级情绪？

无论有着怎样的缺憾，佳士抗争的“硬朗”风格，本厂和前来声援的外厂工人的言行，或许展现了珠三角工人长久积累的某种隐藏和发酵着的情绪，值得深思和关切。小余、小刘等人在厂里的团结尝试，值得珍惜、肯定。他们的经验教训，是想“做工人工作”的其他人，需要认真总结的。总结，是为了把这项共同的阶级事业，向前推进。就如某位取保候审的外厂声援工人在揭发警方恶行的视频当中所说：

“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为自己争一口气，做一回人，不再被他们欺负！”

注释：

[1] 北大学生就「深圳 7·27 维权工人被捕事件」的声援书 2018 年 7 月 29 日

[2] 工人表示社保和公积金都不是足额缴纳的，比如公积金每月扣缴大概 100 元左右，按照应发工资 4000 元的标准，也应扣缴 200 元左右。

[3] “公司自 2005 年至今均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待遇。公司工作环境优美，员工宿舍舒适，配有空调、热水器等。公司设有篮球场、乒乓球台、桌球室、K 歌房等娱乐活动场地，公司元旦邀请优秀员工家属来深圳见证子女的光辉时刻，组织全体员工旅游，成立十个文化社团，组建佳士学院培育员工成长，设立爱心基金扶危济困，建立员工之家活跃业余文化生活”《佳士科技关于恶意诽谤的严正声明》 发布时间:2018-7-30 2:18:32

[4] 7 月 24 日佳士厂门口，建会工人小余的谈话：“去年对玩手机的，厕所抽烟规定罚五百，有人被当场开除……曾经有两个员工拌嘴，也没打架，也罚了 200 元。有一个员工早上起晚了，带早餐去仓库吃，被罚了 200 元，扣掉 180 元绩效，一周不准加班。有一个组长干了 7 年，不太讨员工喜欢。有一天他在办公室抽烟，把烟头塞到垃圾篓里，被副董事长直接找出烟头，当场开除。”

[5] 7 月 24 日佳士厂门口，建会工人小余的谈话：“多数工人没被罚过，大家都很老实，一点都不敢犯错。”

[6] 《致佳士科技职工代表换届选举筹备组的一封信》 螺丝哥 打工一家人 6 月 29 日

[7] 建会积极分子米久平说，7 月 18 日在坪山区聚龙花园党群服务站，坪山区总工会谢志海科长要求他书面声明筹建工会一事与区总工会无关。

[8] 据维权工人说，7 月底佳士老板请全厂员工吃饭，以示安抚。警方也疑似派人驻厂，威慑员工不要乱说乱动。

[9] 7 月 24 日佳士厂门抗议期间某被开除工人的谈话。

[10] 在 7 月 24 日的佳士厂门抗议中，建会工人向大家介绍某声援工人：“她是旁边一个厂的，夜班补贴 5 块，公积金不买。工伤医药费拖欠。”但这番话也等于说，一个不如佳士的烂厂，仍然只有个别人会参与声援维权行动。

[11] 2010年佛山南海本田罢工中，工人向厂里提的要求一度多达100条以上。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第十一条 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组织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华全国总工会文件）》第十二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的委员候选人，应经会员充分酝酿讨论，一般以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为单位推荐。由上届工会委员会或工会筹备组根据多数工会分会或工会小组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报经同级党组织和上一级工会审查同意后，提交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基层工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副主席的选举结果，报上一级工会批准。上一级工会自接到报告15日内应予批复。违反规定程序选举的，上一级工会不得批准，应重新选举。

[13] 我的丈夫余浚聪——那个领唱国际歌的工人 2018-08-10“他的本子上还记着许多劳动法的知识，也经常给大家聊，什么补偿金赔偿金的适用情况啦，什么哪几种算非法开除啦等等”

[14] 2017年8月，小余参加了佳士科技的周年征文活动。在题为《我和佳士一起成长》的文章中，小余写道：“公司领导非常关心员工的生活……公司的这些举措，让我很是意外和感恩”。这次活动之前，小余曾带着一批员工去劳动部门投诉，并遭到了厂里的调岗惩罚。

[1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木鱼和金鱼 普工之声 5月2日

[16] 同上

[17] 被打员工余浚聪何许人也？ 普工之声 5月9日

[18] 换厂是不可能换厂的！窃格瓦拉 普工之声 4月22日

[19] 2018-09-04“平平无奇胡平平，不平则鸣胡平平！——记深圳建会工人声援团工友胡平平” 2018-09-03“7·27被捕工人代表刘鹏华：为工友掏心窝，为工友建工会”

[20] 2018年8月19日“天下乌鸦一般黑，坪山何处艳阳天！”

[21] 2017年版《珠三角抗争工人口述集 第二期》“一切皆有可能！——港资油漆厂员工自述”

[22] 2017年，后来的建会工人积极分子邝恒书参与厂里的征文活动，当选第一名。小余也参加了厂里的羽毛球比赛，获得冠军。

[23] 试举一例：7月20日，佳士抗争员工被开除后，试图回厂复职。他们以及十几名社会声援者被当地派出所先后短暂扣留，一天后释放。7月22日，这些工人和声援者主动回到派出所，持续示威，并向所长提出三点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开除打人黑民警”；派出所赔偿损失，包括检查费、医疗费和全体被关押职工的误工费；派出所向这些工人公开道歉，保证不再违法执法。这与珠三角工人的一般抗争风格有很大区别。通常来说，工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工资待遇、社会保险、离职补偿等等），会去找劳动、社保、信访部门、工会乃至区市政府，唯独不会找公安局，因为它从职能来说，确实不适用于解决一般的劳资纠纷。如果说，坚持厂门示威，还可以理解为直接与厂方对峙，试图影响厂内工人，那么，主动回到派出所示威的举动，只能理解为有意识地把抗争转化为方便社会力量介入的公共事件。

[24] 在这场抗争中，有的声援积极分子已经公开号召“我们工人急需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呼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走进工厂来、走进工业区来、走进工人当中来”（2018.8.14“要为底层谋翻身，要为工人争口气——从小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唐向伟”）

“甩脱尾巴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的短评

佳士工人声援团（2018年12月）

列宁在《怎么办》里曾引证恩格斯 1874 年谈到理论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意义问题时发表的意见：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伟大斗争并不是有两种形式（政治的和经济的），而是有三种形式——这两种斗争并列的还有理论的斗争。彼时，俄国的革命运动正在持续增长、大步向前迈进，而革命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屈服在广阔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四面走散甚至向后退却。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观点，正是为了同社会民主党内甚嚣尘上的狭隘经济主义、机会主义者做彻底而坚决的斗争，而这一斗争最终的结果，已广为后世之人所熟知和称颂。

历史的沧桑变迁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伟大经验，并没有使一部分人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所带来的顽固偏见。在几乎每一次人民运动的浪潮汹涌的时候，总有些人要袖着双手于一旁，从嘴里挤出些阴阳怪气的酸话，或是，如列宁所说，在泥潭里大喊大叫，卖力拉扯在崎岖险阻的道路上并肩前行的工人和同志们的手，妄图拖累事业，使事业的落后性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

近日在某知名左派网站上读到一篇评论佳士事件的文章，题为《“适应节奏很重要”——佳士事件短评》。光看标题就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但全篇所充斥的狭隘经济主义、尾巴主义论调，还是着实令笔者感到荒唐，进而愤怒。

一、“不是特别离奇坏”的佳士

文章先从佳士公司的一般情况说起，认为“佳士公司员工的待遇在深圳算中等略偏下的水平，谈不上特别离奇的坏”：社保相对“正规”，福利聊胜于无（文中还把佳士用以自吹的 K 歌、旅游等都写上了），工资没有惊喜；即使有臭名昭著的《十八禁》，但在实践中并

没有触及到多数员工；即使老板使用调休、罚款之类的损招，只要马马虎虎过得去，工人都可以忍；更有“集体持股”的法子凝聚管理层士气。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佳士工厂没有出现一个能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言外之意即，佳士还没有黑到值得工人去反抗的地步！

我不知道作者是不甚了解还是有意忽视，竟对佳士维权工人一遍又一遍揭露的佳士工厂残酷压榨工人的斑斑劣迹置若罔闻。不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非法调休、强制超时加班（2018年3月，员工连续上班一个多月没有休息，每天都超过12个钟）、强制徒步、管理粗暴、偷窥监视辱骂并殴打员工……这其中的哪一项不让工人们怨恨、诅咒？哪一项不是在尽可能地将工人的生存压低到最低最低的水平？哪一项不是在剥夺工人作为人的尊严？哪一项不能够成为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

就单拿《十八禁》来说，作者煞有介事地在后面补充一句“在实践中没有触及到多数员工”，显然是想说明这样的罚款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那么地坏。这可真是小资产阶级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典范。佳士的车间主管们动辄就要从工人口袋里抽走300-400元不等的现金（大多数落入自己的囊中，用于嫖娼等腐败的个人生活），比工人在坪山当地租一个宽敞单间的农村房一个月的花费还要多。在2018年4月，仅从几位建会工人那里反映的，就有超过10名工人被以各种理由罚款。而其中的几个典型例子，如胡志舍身救火却被以“未穿工衣”和“顶撞上司”为名倒罚300，余浚聪的同事仅因在车间吃早餐便被罚1000元，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佳士十八禁盘剥工人、从骨头里榨油的血腥本质！难道这样的禁令，不是对所有员工权益的普遍侵犯？难道胡志和这位工友的遭遇，不是每一个普通工人都会碰到的？自然，作者会认为，在有600普工的工厂里，一个月只有十余名工人被罚款，说明多数员工的利益并没有被触及。然而事实是，多数员工之所以没有被罚款，正是在这样严苛的管理制度之下，工人的权益早已被剥削殆尽，屈服于资方长长伸出的触手之下，忍气吞声。难道作者认为，这样的罚款应该再多些，而不是再少些才好吗？

“——别胡说！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作者肯定会这样叫道。可是，不要争辩，从作者对佳士厂的颇带辩护性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作者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要想工人运动发展，黑厂需要再黑一点（要有能刺激大家的利益焦点）！这样的话出自想要领导工人运动的左派口中，真是荒谬无比！

厂子黑不黑，工人们最知道。从日常对强制徒步、非法罚款的吐槽，到多次前往龙田街道劳动办和坪山区人力资源局投诉，再到不足两天时间（实际上是下班后不足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征集到八十九名工友签署组建工会意愿表，佳士工人们反抗黑厂剥削、争取权益的渴望早已如暗火般在涌动。诚然，不是所有的不满都能有效地转化为英勇的行动（特别是在如此严苛的管理制度和对工人的全面压制之下），但这里呼唤的，正是先进工人或左派运动家的自觉性，是用斗争戳出无边黑暗的一束光，在斗争中教育、启发和锤炼群众（首先是先进群众），而不是用幻想中的群众运动来取消现实的阶级斗争。

说到底，真正的群众运动，依靠的是先进工人和左派运动家的自觉性、群众的反压迫和组织起来的意识的觉醒，而不是资本主义把工人们一个个逼到绝路上之后的殊死一搏。哪一个左派运动家要是认为工人运动的逻辑在于后者，他就是无可救药的经济主义者，自甘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完全逃避自己肩上的重担。

二、所谓“非典型”工人

说到先进工人，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作者在文中，将参与佳士维权的工人称为“一小批”的“非典型工人”，人为地将他们与普通的工人隔开，暴露了自己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无知和傲慢偏见。几位维权工人的人物故事早已在网上流传，不知作者为何又一次置若罔闻。就拿文中所说的余浚聪为例，他出身江西上饶的一个贫苦农村，因为急于出来打工挣钱而没能读完中专，在工业区摸爬滚打好几年，见过无数黑厂，也经历过城中村出租房的大火。他的妻子（同样参与了这一次维权斗争的黄兰凤）在佳士因为加班劳累而流产（又是

佳士的一桩劣迹），而他因为常常提意见，就被工厂各种穿小鞋，甚至上了坪山区企业的黑名单。可以说，余浚聪的经历，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者共同的经历：出身最底层，深刻体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也由此萌生了反抗的意识。而他身上所展现的朴素的正义感、对工友的热心、努力上进等等，正是中国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普遍美德（并不像某些资产阶级所指摘、小资产阶级所臆想的那样，工人都是麻木和堕落的）。这些特点，在米久平、刘鹏华、李展等其他维权工人身上同样能找到。

我猜想，大概作者说他们“非典型”的原因，是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抗争精神似乎“高人一等”。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早已明晰，是什么让这些工人们成为反压迫斗争的英勇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洗礼！这也正是佳士斗争的伟大意义所在。在佳士斗争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中国新工人究竟是什么模样。他们能只身领导上千人的罢工（96年出生的女工尚杨雪，曾作为唯一的普工代表领导了赛格晶端厂全厂大罢工），能喊出“为了我们的阶级”的口号，能无畏无惧地在暴力警察的包围下唱响属于工人阶级的《国际歌》！工人阶级总是天生地倾向社会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浚聪等先进工人，绝不是“非典型”，而恰恰是“典型”！他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典型的、杰出的代表，是未来将要从中国的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多地提炼出的典型的、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而只有在被自己的阶级偏见糊住了双眼，或是别有用心地要降低工人的觉悟的人，才会说出“工人的主要日常特点，就是努力适应环境，专心挣血汗钱”、“工人日常的隐忍，来自他身为被统治阶级的整体状态，也来自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制度性服从”、“深刻的被动”等等这样的鬼话来。

三、左派运动家需要适应什么“节奏”

工人阶级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整体状态，究竟是“深刻的被动”、“日常的隐忍”，还是作为最革命的阶级，热切地向往变革、向往当家作主？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早已在理论上进行了回答，而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在现实中进行了回答。

让我们就单单来看 2018 年这短短一年的时间吧！沃特玛工人罢工、塔吊司机罢工、卡车司机罢工、外卖工人罢工、尘肺病工人维权、佳士运动、富士康罢工……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就拿佳士公司所在地坪山来说，早在佳士事件爆发以前，坪山地区的阶级矛盾已是深重如山，工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沃特玛工人一浪胜过一浪的罢工斗争，工人由堵厂门发展到堵劳动局、堵区委区政府。肯发厂罢工被警方暴力镇压后，工人们集体上楼顶以跳楼震慑。劳动局的投诉总是人满为患。今年赛格晶端全厂罢工，工人在斗争中彻底不听政府部门的忽悠，他们所表现的斗争水平和策略相当之高，并取得国内搬厂斗争补偿的最高水平。

工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维权斗争中，受到锻炼，不断成长，越来越表现出“深刻的主动”、“日常的抗争”。在这个过程中，缺乏的恰恰是左翼运动家的首创精神，对群众的领导、启发，热情的毫不懈怠的工作。如果说，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需要去“适应节奏”，那么需要适应的，正是这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的节奏，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节奏”！

四、工人运动的发展

可惜，在作者看来，当前运动的缺点不是自觉力量的缺失，而是自觉力量太高于自发力量，“拔苗助长式地提升当前工人抗争的水平”。他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佳士本厂的工人没有能够大批地站出来支持维权抗议，以此就给这次运动扣上一个“脱离群众”的帽子。

上文已经说过，佳士厂对工人的盘剥早已在工人中间引起了普遍不满，但这种不满要转化为行动，需要的是先进工人的领导、组织和教育。在 7 月份以前，佳士的先进工人们所做的，正是耐心细致的团结工友的群众工作，如举行聚餐活动，进行线下宣传，又通过去劳动局投诉，办公众号，建微信群等等方式，揭露工厂的违法现象，倾吐员工心声，向工友们宣传团结意识和维权意识。

由于森严的管理制度，厂内的白色恐怖氛围，客观条件的限制（余、米、刘等只能接触到一百名左右的员工），和员工的极大的流动性（工厂基本三四个月“换一次血”），让余、米、刘等人所做的努力，遇到了极大瓶颈，难以达到积累工友力量的目标。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佳士先进工人们提出组建工会。八十九位工友的签名（而且动员还没有结束就被打断了）说明组建工会是符合工友的诉求的。而发动签联名信，就是对工友最初步的最好的宣传。这大概是那些嘴里高喊脱离了群众，却从来没做过团结工友工作的运动导师们看不到的。

当建会工友才刚刚迈开第一步的时候，嗅觉敏锐的厂方立即发现了此事，并开除了带头建会的员工。工人们被赶出厂外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在大门外进行斗争。这个时候不争取复工进入厂内，接触到其他工友，那谈什么不脱离群众？

当坪山警方毫无顾忌地介入劳资纠纷，并抓捕建会工友的时候，斗争的主要对象必然由厂方转变到了暴力机器这里。作者在文中毫无理由地认为，佳士工人这么做，是“不想按照普通维权工人的惯用思路去解决‘非法开除’的问题，也就是常见的‘老板，赔钱！’（或是满足其他物质要求），而是冒着牢狱之灾的风险，准备把冲突本身延续下去，让它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甚至无端地猜测，“佳士抗争，尤其是建会-声讨派出所-社会声援等几个环节，是一些急于看到‘石破天惊’效果的年轻工人，在某些左翼主张的影响下，人为炮制的‘宣传队’行动。”

原来在作者眼里，“普通维权工人”的惯用思路，就是向老板伸出手来讨要“物质要求”，而佳士工人们将斗争从一个厂内扩大到燕子岭派出所，就是“人为炮制”的行为艺术！这几句话，说得好听点，是狭隘的经济主义，妄图把工人的斗争永远局限在一个工厂里的经济斗争。说得严重点，不过是在用玄乎其玄的语言来包装资产阶级对工人“非法闹事”的污蔑，其背后的逻辑细究起来，无非是镇压有理，反抗有罪！

现实已经无数次地教育工人，每当罢工的时候，不但要对付工厂管理、保安，往往还要对付政府部门（劳动局、工会，还有警察）。工人能不能获得罢工的胜利，很多时候起决定作用的是警方介入的决心。如果工人斗争策略高，发动工友多，警方介入决心小，这时候斗争往往会取得胜利。如果警方介入决心大，则不管工人斗争策略高还是低，发动工友多还是少，往往会面临失败。索尼厂四千人罢工，裕元鞋厂四万人大罢工，不都是深刻的教训吗？工人运动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要碰到这个问题，这是当前中国的工人运动绕不开的一个坎。我们不能把工人运动的胜利，机会主义地放在警方不镇压的前提下，而永远逃避与暴力机器做正面的斗争。

当佳士工人在厂门口斗争的时候，暴力机器燕子岭派出所登场，把佳士工人肆无忌惮地打了、抓了。这个时候斗争的场所自然是派出所了（当然这个过程中，先进工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开展对佳士工人的工作，并提出工友诉求），主要诉求必然是要求放人与严惩打人黑警了。如果不同警方进行公开的斗争，如果不去痛打派出所，动摇其介入决心，就不可能有条件进行其他任何斗争，因为警方随时都可以肆无忌惮的干预。

所以选择在派出所门口示威的办法，不但是斗争发展的自然和必然过程，而且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所以这次斗争好就好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在把斗争的矛头，正确的指向了派出所。而斗争的成果也是显著的，极大震慑了深圳政法委系统，李华楠下台的巨大影响力，将使未来警方在介入劳资纠纷时有所顾忌。

从长远来看，工人运动的发展，必将并且已经开始摆脱局限于一个厂内的经济斗争，而是要朝着一个片区（这一次，整个坪山地区的先进工人齐聚燕子岭派出所，多么令人振奋！）、一个行业（塔吊、卡车），乃至全国的范围去发展，其斗争的性质，也要朝着越来越政治化的方向去发展。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最终所要胜任的历史任务，是政治任务，而不是肤浅的提高工资、改善福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次运动的“群众”，早已经不是佳士一个工厂的几百普工，而是全国的工人阶级、进步学生和左派群众。我们看到，在这四个余月的时间里，全国上下的进步工人、学生、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团结到了声援团的旗帜之下，并肩战斗。作者为什么看不到这部分力量的崛起，却只盯着佳士厂的工人不放？为什么不认为我们的运动首先应当团结、启发和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先进群众，而要弯下腰，把运动拉低到中等甚至落后群众的水平呢？

诚然，我们要承认，佳士运动中仍然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我们承认，佳士厂普通工人的工作没有做到最好，建会工人的组织能力和斗争能力还不是很成熟，对于斗争也没有做充足的准备，特别是当积极的建会工人全部被工厂违法开除之后，普通工人便失去了能将他们组织起来的领导者，而从外部去做工作（如佳士工人尝试的，在员工聚餐时去发传单，在厂门口宣传，等等）有很多局限之处。但是，我们毫无理由拿这些运动的稚嫩性去指责我们的先进工人。他们正在提高能力，也必将能够提高能力！而我们要做的，正是热情地伸出双手，迎接新的工人斗争阶段的到来，用同志式的思考和辩论，认真总结佳士斗争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运动未来的发展。

所有真诚的工人事业的支持者们，让我们快快甩掉拖累着我们的经济主义、机会主义的沉重大尾巴，用继续的战斗保卫佳士工人们争取到的胜利果实！这是新生的朝阳掷以黑夜的第一支标枪，伟大的时代即将来临，让我们和勇敢的工人们一起并肩同行吧！

论左翼持久战

五百二（2018年12月26日）

【2018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25周年。曾经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早已作古，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毛泽东的故事还在这颗星球上流传，他的思想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的精神还在鼓舞着无穷的人们。值此毛主席诞辰125周年之际，激流网特举办网络文艺晚会以表达纪念，致敬前辈。本文为激流网代表五百二在晚会上的发言。】

125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诞生于南中国的严冬里。冬天，仿佛寓意着黑暗的旧中国，正如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台词：地是黑沉沉的地，天是黑沉沉的天。

回到125年后的今天，在很多朋友看来，今年这个冬天也是分外寒冷。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不妨重温一下80年前的1938年，毛主席写的一篇很有名的政治军事著作兼哲学著作：《论持久战》。

80年前的中国，如果用季节来形容的话，也是处于严冬时节——1938年5月，日军进攻势头凶猛，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会战失败，武汉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而当时的共产党武装还十分弱小，党内也有人冀望于国民党正规军，“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轻视自身的力量，轻视游击战。而提出这个右倾口号的，正是当年犯左倾错误导致党遭受惨重损失的人。

与“亡国论”相对的，还有“速胜论”——有人寄希望于英美等国援助或者苏联出兵，也有人因局部的胜利而轻敌，看到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却看不到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基本事实。

《论持久战》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事实，更是论证了中国必胜的原因，详细地指明了争得胜利的路径与步骤。《论持久战》不仅有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路线图，而路线图的每个细节里都包含着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以我们说，《论持久战》是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

《论持久战》是阐述敌强我弱情况下如何取得胜利的典范。毛主席一辈子都在以弱势地位挑战强敌：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苏修，还有晚年直接针对的走资派，每一次都能取得伟大的胜利。的确，一切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初期都是弱小的，一切陈腐的、反动的力量都曾经是庞然大物。所以，《论持久战》不仅对当时的抗战有着特殊的意义，对先进但是弱小的事物也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

左翼斗争的基本态势

在《论持久战》中，毛主席分析了敌我态势。在敌强我弱的大前提下，敌有一优三劣，我有一劣三优。敌的一优三劣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很强，但帝国主义性和军事封建性决定了它的退步性和野蛮性；国度小经不起长期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我的一劣三优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均不如日本，但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且有代表着进步方向的共产党；是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大国；在国际上得道多助。中日双方的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那么，今天的左翼斗争的基本态势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有理无力。有理无力的典型表现，就是我们嘴上经常高喊着“坚决斗争”、“誓死捍卫”、“决不妥协”，但我们手中却缺少最基本的斗争手段，没有像样的牌。态度的坚决和手段的无力形成鲜明对比。

问题何在？客观原因是，在现有条件下，左翼无法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左翼宣传鼓动的范围有限。毕竟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分离。老祖宗告诉我们，光讲道理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物质力量。左翼的物质力量是什么？不是主流庸俗理解的物，不是钱，而是人，是先进的阶级。先进阶级的力量又表现在哪里？在于组织起来。这个道理不需要多讲。

左翼运动重在宣传，是讲理的运动。阶级运动重在组织，是讲力的运动。理论彻底就可以掌握群众，掌握群众的过程就是两者结合的过程。所以理是可以转化为力的，但是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的分离在历史上是常态，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在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上，两者都有一个从分离到结合的过程。

但在中国，这个过程也不是直线发展的，有曲折与反复。国企改革过程中，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一定程度是结合的，老工人强调的是“依理斗争”。这有其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国企老工人对毛泽东年代、对社会主义有着高度认可，由主人公地位到雇佣奴隶地位的变迁，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这种条件下，毛泽东思想可以作为凝聚老工人的手段。在这个阶段，国企老工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参与左翼活动，并没有任何“违和”感。辽阳铁合金厂工人扛着毛主席像上街，雄赳赳，气昂昂，这是本世纪初非常经典的一副画面。2009年一场“老工人怀念毛主席”的报告会，通钢工人领袖吴敬堂的报告也引起整个左翼的强烈共鸣。

左翼斗争的两个阶段

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当代中国左翼的运动的阶段划分。简单地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退却阶段，或者叫社会主义遗产保卫战阶段，参与者主要是老工人、造反派、体制内分化出来的一批老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老干部，一句话，主要是在剧烈的市场化运动中政治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群体。这个阶段斗争的起点很高，一度轰轰烈烈，

但却是一个总体衰落的过程。国企改制的基本终结，意味着这个阶段的基本结束。2009年的通钢斗争可谓这个阶段的绝唱。这场斗争尽管牵涉面极广，但实事求是地讲，仍是少数人的斗争。近代中国工业化起点很低，直到毛泽东年代结束，能够享受城市工人待遇的仍然是少数。8 亿人口，80%在农村，而三大差别中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正是毛泽东忧虑的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部分。之后的市场化改革，突破点正是农村这个薄弱环节。

无庸讳言，这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失败了，市场逻辑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由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但是，这个阶段有个十分伟大的功绩，即左翼启蒙运动，这个阶段厘清了建国后的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继续革命理论，澄清了文革结束后被弄得混乱不堪的国史，批驳了对西方国家的大量迷信观点。不对比不知道这个功绩的伟大：直到二十年前，文革是被完全妖魔化的，即便要有所肯定，也是战战兢兢，先抑后扬。而今天，肯定文革已经是左翼的基本立场。

左翼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新生代崛起阶段。参与者主要是深受市场化之苦而又思想活跃的群体，包括一些敏感的新工人，包括脑力无产者，青年学生，部分所谓“中产阶级”。一句话，是在改革中成长起来、对改革最初抱有好感却又日益不能忍受被市场异化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斗争起点低，自发性强，但数量却十分庞大，且在日益增长。到目前为止，新工人群体的大部还未参与进来，但却是最庞大的潜在参与者。中国的无产化率已近70%，再加上大量的同盟军与同情者，已经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有史以来单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最为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

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不同于第一个阶段，左翼运动与阶级运动是严重分离的。新工人不同于老工人，社会化、政治化层度低，他们也从未享受过公有制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待遇，很多人对意识形态有冷漠感和生疏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口号并不能直接作为动员工人的手段。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朋友想用第一阶段的办法来参与第二阶段的斗

争，满腔热情，结果却是碰了一鼻子壁。为什么？因为斗争的时间、地点、条件都变化了。刻舟求剑，焉有不败之理。

左翼运动，从形式上讲也分为两个阶段。2012年前，是少数左翼门户网站一统天下的年代，左翼运动仍沿用传统的科层结构，一些有理论水平和社会资源的人占据着这个科层的顶端。今天，则是自媒体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意见领袖民间化、年轻化、分散化。有的朋友痛心于左翼黄金时代的丧失，殊不知这是巨大的进步。普通人可以获得过去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获取的信息。信息传播扁平化，左翼在新的起点中争鸣、斗争、融合，将产生更大规模的团结与统一，这符合历史辩证法。

左翼中的悲观论

类似于抗战中的亡国论与速胜论，左翼运动中也有悲观论和速胜论。

有一种悲观论 体现于有意无意误判主要矛盾。夸大民族矛盾，渲染美帝的强大与恐怖，将真正的主要矛盾回避或无限期后移。动辄“亡国灭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些观点前些年比较流行，现在是形势比人强，提的人渐少了。但是，“亡国灭种”论的民族主义者少了，“大国崛起”论的民族主义者又多了。两者异曲同工。

还有一种唯心主义的悲观论。只看到形势在一天天坏下去，国企一天天私有化，群众没有起来，毛主席那样的领袖出现遥遥无期。这些朋友看不到今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蕴藏着比过去任何年代都要多的能动的社会主义因素，看不到他们的日益成长壮大，也看不到现有条件下资本积累逐渐无以为继的局面，悲观在所难免了。

左翼中的速胜论

左翼速胜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抱幻想的速胜论，一种是轻敌的速胜论。

抱幻想的速胜论，这种速胜论的主要表现为试图通过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找到回归社会主义、快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典型的论调是健康力量论。还有不少朋友试图从现有的主流生产体系之外找到解决问题的“社会主义因素”，如集体经济、三线遗产、老工人等。我们与这些朋友的区别在于，我们并非不承认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存在，而是认为这些因素不是起主要作用的能动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仍然在于人、在于团结起来的阶级，即便这个阶级看上去还比较“落后”。

轻敌的速胜论，这种速胜论通过第一阶段的方法，通过网络鼓动等大轰大嗡的办法，通过“以理斗争”的手段，快速完成两种运动的结合。这种运动的结果往往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欲速则不达。如果这种办法能成功，那食肉者真的都是饭桶了。

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没有康庄大道。看上去最省事的路径，往往是条死路。看上去艰苦曲折的道路，往往却是捷径。

还有一种轻敌的速胜论，宣布目前已处于相持阶段。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直接将资本的烂下去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强起来，二是将劳动收入的增加等同于无产阶级的强大，由此认为目前处于相持阶段。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只能来自于其组织性与觉悟性，如果没有这一点，无产阶级是称不上强的，即便在市场中暂时占据有利地位，但这种地位没有任何保障。

青年成长中也有速胜论。青年左派需要同时进行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工作，其阶级感情也需要经历从同情心、从救世主心态，再成长为真正与所服务的阶级融为一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应急于求成，自我拔高，否则，易造成大起大落，前段时间还高呼口号的，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年轻人是最可宝贵的财富，如此流失是让人心痛的。

从自发到自觉的速胜论。一些年轻同志强调自觉性，强调主观能动性，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不注意从从自发到自觉的中间环节——列宁所谓的“灌输”，而“灌输”的前提是需要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需要与灌输对象建立起水乳交融的关系，需要注意灌输的方式方法，这种“自觉性”很容易变为激进冒进，激进冒进之后又是消沉后退，历史的殷鉴太多。

抱幻想的速胜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速胜论会在某种场合奇妙地结合起来，也很易转向悲观论，因为其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精英思想。

左翼持久战

左翼第一阶段的工作是伟大的：迟滞了私有化的进程，进行了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澄清了红色历史，教育了大量的社会群众左转。

左翼第二阶段的工作更伟大。第二阶段的工作建立在全球资本主义无以为续的现实基础之上，建立在更深更广的群众基础之上。第一阶段的工作重在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阶段重在解决“怎么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个实践的问题，需要很多人多年如一日地脚踏实地去。第二阶段要完成的任务，是与自己的阶级有深度的结合，而不仅是追求象征意义上的结合。

左翼长期以来习惯于第一阶段的工作方法，即宣传工作的方法，以扩大影响力为目标，以调动左翼群众和社会群众的情绪为手段。这些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是不够的，在第二阶段，如果为了追求某种象征意义，牺牲极为可贵的有生力量，不是这一阶段应有的作为。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与工作策略。

毛泽东指出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我态势转化的办法：尽管敌强我弱，但时间在我一边，因此需要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在战术上，需要分别采取重视游击战

（相持阶段）、运动战（防御与反攻阶段）的方法，而不宜采取阵地战的办法。需要积小胜为大胜。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高度重视统一战线，而不能曲高和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党领导下的抗战取得胜利靠的不是百团大战，靠的是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土得掉渣的办法。日军怕的不是阵地战，怕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怕的是军民团结如一人，怕的是国内和国际上统一战线。

第一阶段以宣传工作为主，对象是思想活跃的左翼网友和社会群众。这种工作是面的工作。因此面要广，问题的面要广，宣传的面也要广。这个阶段的工作要做大量的理论论战、问题辨析，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达到理论上的彻底性。

第二阶段需要深入的阶级工作，以群众的具体利益、短期利益为切入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列宁所谓的灌输工作。这种工作需要强调阵地战，需要一个个阵地巩固，由此再复制、扩展开去，由点及面，逐一巩固。由此特点，决定工作的方法不一样。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动辄讲大道理，不能简单地指责群众落后、不觉悟，不能以理论上的纯粹与否为评判标准。

这个阶段需要做深入的阶级工作和群众工作。需要积小胜为大胜，一般要拒绝大轰大嗡的斗争方式。

积小胜为大胜，低调谨慎地工作，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保守退缩，回避斗争。按毛主席的说法，应该开展“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这样的斗争。“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在整体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绝不会妨碍我们在某些局部、某些时间形成相对的优势。

结语

左翼运动今天面临的局面是“有理无力”，占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面临如此局面则是“有力无理”，这就决定了时间在无产者一边。这里的“有力”，是指有产阶级在经济，组织，舆论等方面占有优势，“无理”是指其发展受限于规律性，劳资矛盾，经济问题，民族矛盾，区域与国家发展不平衡，生态危机，环境危机，每一项都是十分致命，却没有任何破解的良方。

中国最广大的无产者，则处于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中，即所谓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尽管起点相对低下，但是由拥有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数量，最优秀的红色遗产，有着左翼运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因此具备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由量变到质变的可能。而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有大量脚踏实地、不务虚名、不尚空谈的实干家。

尽管冬天来临，但我们坚信，中国不会缺这样的实干家。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毛主席生于冬天，也热爱冬天，他尤其热爱冬天里的梅花和雪。诗人毛泽东恋梅、惜梅、品梅、咏梅，恋雪、咏雪。在他的诗词中常常反复吟咏梅花和雪，“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些诗句，我们耳熟能详。

毛主席赞美梅花和雪，赞美的是不惧逆境、勇于直面困难的革命者，鄙夷的是那些经受不住大风大浪考验的脱逃者。

朋友们，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附：红色中国网编辑的评语

我们还注意到，激流网同志在论“左翼持久战”的发言中，以不点名的方式，对红色中国网工作组的严元章、远航一号等同志表达了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次佳士工人斗争失败，就策略方面来说，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声援团同志照搬过去老工人的一些斗争方式方法，而恰恰是因为声援团同志没有真正学习和应用中国新老工人在实践中已经发展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斗争方式，反而迷信资产阶级法律、脱离中国政治实际、照搬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一些局限性很大的斗争方式。我们赞成激流网同志所主张的，左翼青年积极分子应当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其主要任务，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而是首先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学习工人阶级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斗争经验，向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靠拢，先当学生，然后才能当先生。我们赞成激流网同志所主张的“持久战”以及既反对失败论、又反对速胜论的观点。但是，要真正坚持持久战的思想，就不仅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念，还必须正确地把握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以及中国现代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我们知道，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并不是唯一提出持久战思想的人，但是只有毛主席，才正确地总结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彼消此长的必然过程并因此得出了抗日战争虽然持久但是必然胜利的结论。如果如激流网同志那样，仅仅是抽象地肯定“持久”，却不承认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在上升、资产阶级的困难在增加，是不可能得出关于中国阶级斗争规律的正确认识的，也是不可能真正实现阶级斗争持久战的。在这方面，不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且也要反对激流网同志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的“中帝论”错误思想。正是因为从“中帝论”的错误思想出发，激流网同志才简单地认为，现在的基本形势是资产阶级“有力”而左翼或无产阶级“无力”，而没有看到，二者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对无产阶级有利的变化。我们赞成激流网同志所提出的，左翼运动今天需要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但是，这样的实干家应当是思想上高度自觉的实干家，是初步掌握了中国阶级斗争基本规律并可以将其应用于实践的实干家，是有独立思想、敢于负责、敢于批判、敢于“反潮流”并独立自主地解决阶级斗争各种实际问题的实干家，而不是某些宗派团体操纵下的盲从的木偶。有关与此相关的各项问题，红色中国网愿意与激流网和其他各小组的同志开展进一步的交流。

与红色中国网“座椅”同志的论战 —— 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中

尤玲（2019年1月）

今年7月开始的佳士运动还在顽强进行中，但不少左派同志似乎比中特更急着要对其定性。红色中国网原定于2019年元旦发布的檄文，不仅提前四天刊发，而且连原定的上稿日期“2019-1-1”都没改。巧合的是，在檄文发布当天，我国某最高学府又双叟叟爆发了校园官僚打压进步学生社团的丑闻——13名静站抗议社团被非法改组的同学粗暴地抬走，随后在无信号的教室中被关押近24小时。现在想来，同样是面对打压，有些同志会火急火燎地用鼠标和键盘指点革命，颇有思想导师的做派；有些同志则身体力行反抗强暴，在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中争取每一分每一寸空间。只可惜，双脚不踏实地，只知仰望书斋的天花板，用键盘和鼠标名为“建议”实为讨伐的“座椅”同志，恐怕对革命不仅无功，甚至有害。为了运动长远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肃清这种“座椅”倾向。

首先，这篇名为“建议书”的檄文，对佳士运动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佳士运动发端于佳士工友自发的依法组建工会斗争，随后资方和国家机器对其合力打压，工友因此奋起反抗，从而引发大量左翼学生的关注。学生中最积极者，直接奔赴深圳坪山现场，组建佳士工人声援团，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宣传。直到广东警方8·24暴力清场，线下声援行动告一段落，但线上行动从未停止。所以，佳士运动显然不是什么青年左派“沾染了大量小资产阶级恶习”的突发奇想之举，而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在自觉左翼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其中后，慢慢发展为工学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如果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那恐怕放眼古今中外，都找不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工运了。

其次，某些“座椅”导师在安逸的书房里呆太久了，平时也不怎么接触工人，更别提扎根在工业区做工人的组织工作，所以只能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环境和立场出发，想象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凭空脑补出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这种“座椅”导师一没

有扎实的政经和社会分析，二没有落地的工人调研和组织基础，凭什么充当革命导师，指点中国工运呢？对于这种对运动有弊无利的指指点点，我们有必要予以回应。

为什么要选择在沿海地区发动新工人，而不是“到广大内地去”开展斗争？中国有 2.87 亿农民工，占全国工人阶级总量 70%以上。相比之下，全国只有约 3000 万国企工人。超过七成农民工来自中西部地区，超过一半农民工在东部地区务工，其中又以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地最集中。事实上，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东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正是新工人斗争最前沿、最集中、最激烈的地带。2013 年，广东省工人集体行动个案占全国比例达 38%。近两年来，虽然广东的工人集体行动数量占比有所减少，但仍居全国之首，几乎是其他省区的两到三倍。所以请问，为什么我们当下不在中国工人阶级规模最庞大、分布最集中、斗争基础最好的东部沿海地区发动斗争，而是跑到工人阶级规模不大、分布零散、斗争基础一般的“广大内地”去“做长期普遍的群众工作，迎接未来的伟大斗争”？

而且，佳士工人的遭遇不是个例。他们奋起抗争后备受打压，反映的正是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压迫的日益深重。2013 年后，中国经济进入增速下滑的“新常态”，加之今年中美贸易战前途未卜，珠三角作为全国最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中心，自然首当其冲。近年来，珠三角的罢工多与关厂和搬迁引发的劳资纠纷相关。无论是 2013 年的迪威信，还是 2014 年的哥士比，抑或是 2015 年的庆盛，均源于工厂搬迁或产业升级带来的员工安置问题。当罢工工友要求资方依法赔偿和安置时，工厂却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悍然违法，不仅不依法赔偿，还威胁、拘捕和起诉工人代表，甚至导致罢工工友以跳楼自杀方式抗议。以上 3 宗罢工事件，分别以工厂低于法定赔偿标准赔偿和遣散工人、被解雇工人起诉工厂非法解雇却最终败诉、起诉罢工工人和以低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打发工人告终。缺少话语权和文化资本的工人，也难以将他们的遭遇转化为大众舆论热点，大多数人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一无所知。

以上种种，已让包括佳士工友在内的中国工人意识到，除非工人能自己组织起来，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根本没有任何既得利益者会真正在乎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佳士工友为自主筹建工会而发起的抗争，并非个别激进工人突发奇想的狂热行为。它恰恰说明，广大中国工人长久以来缺乏真正代表他们的组织。同时，不管是佳士工友，还是声援团成员，都清楚工会是斗争和组织策略，而非斗争的最终目的。这些先进工人和学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在佳士运动中，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没有一个诉求是以成功组建工会为最终目的，没有一个诉求是想通过组建工会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在资产阶级的带领下工会斗争最终必然会走向妥协，而在无产阶级带领下工会斗争则会战斗到底，直至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当我们连一家工厂、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斗争都还没发动成功时，又何谈“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呢？某些“座椅”同志的批评，既不能对扎实推进群众工作有任何实际帮助，还相当于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同志插刀。

佳士运动尚未结束，以佳士声援团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还在不畏强权，坚持斗争，反而是看客们这么快就下了失败的结论。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任何一场胜利，都是建立在许许多多失败之上的。我们重视失败，我们也从失败中学习，但我们并不悲观也不沮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必然要经历的坎坷。但请问，现在是谁悲观了？谁沮丧了？谁投降了？我们欢迎任何关于推动中国工人运动未来发展的战略和战术讨论，但我们坚决反对一切空想的、扣帽子的投降主义。对于这种“座椅”同志，我们只能说一句：出门右转，好走不送。

红色中国网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 —— 代“座椅”同志答复尤琳同志

远航一号（2019年1月）

尤琳同志：

你撰写的批驳红色中国网建议书的文章，经其他同志转到本网，我们已经拜读。你这篇文章是以个人名义写的。我也以个人名义给你答复。

你说，你这篇文章是与红色中国网“座椅”同志的论战，又说，这位“座椅”导师，“只能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环境和立场出发”，“凭空脑补出中国工人运动的未来”，“凭什么充当革命导师，指点中国工运？”

我们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确实有一些同志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小资产阶级身份；还有一些同志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身份。我们编辑部中，既有经常参加一线斗争的，也有主要做理论宣传工作的。无论是否参加一线斗争，我们都愿意把你给我们的这个“座椅”的雅号当做一种鞭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实际，要正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并与其做斗争。这种斗争，是不容易的。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追求马列毛主义几十年，不敢说自己就已经改造好了，只能说算是经过无产阶级一定程度改造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至于所谓“充当革命导师”、“指点中国工运”，更不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马列毛主义者应当有的思想。向无产阶级学习，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革命知识分子不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努力结合实际、向群众学习的同时，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努力认识资本主义的一般矛盾、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般规律，探索资产阶级由强变弱、无产阶级由弱变强的条件和道路，并将自己的理论认识应用于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的建议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这次佳士工人和“声援团”的斗争遭到了失败，大家都很痛心。当然，你们现在不认为这次斗争“失败”了。但是，斗争的目的没有达到，佳士工人和“声援团”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些都是事实。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在文章中说：“包括佳士工友在内的中国工人意识到，除非工人能自己组织起来，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否则根本没有任

何既得利益者会真正在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的，我们完全赞成。无论资产阶级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当然都不会在乎工人阶级的利益，还可以加上一点，也绝不会在乎进步学生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但是，这是不是说，在当前的条件下，不组织属于工人自己的民主工会，工人就不能斗争了呢？你自己所引用的，在珠三角地区大量工人斗争的数据，这些斗争难道都是在有了公开的、“合法的”工会以后才发生的吗？

通过走资产阶级法律程序来成立工会，你们已经尝试过了，此路不通。你要成立工会，资本家就找黑社会来打你；你如果打不过黑社会，警察是不会来帮你的；如果你把黑社会打跑了，只要资本家出的价钱合适，警察就会来镇压。希望通过发动国内外知名人士联署呼吁来给资产阶级当局施加压力吗？在过去几个月中，你们已经体会过了，这样的舆论压力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当局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你们还是认为，要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就必须搞工会（哪怕是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而离开了工会，就什么都做不了；那么请问，你们还能做什么呢？把这次佳士斗争的失败经历再重演一遍？再送几十位同志进监狱？

如果按照你们的逻辑，工人运动就必须搞工会，而工会只能靠你们这样一个厂一个厂的发动，现在连一个厂的工会都发动不起来，那么，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用多少个世纪才能降落人间？

我们的看法是，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斗争主要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斗争中将产生大批的经过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优秀分子。在这个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包括进步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不是用包办代替的办法从外部去“发动”工人，而是要努力学习工人阶级在实践中产生的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比如，你们所宣传的尚杨雪同志，她就是在没有工会的条件下，领导工人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像这样的经验，你们为什么不虚心学习并努力推广，为什么非要对实践证明走不通的工会道路情有独钟呢？这到底是工人自己在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普遍要求还是你们在北大、人大的书斋里想象出来的呢？

如上所述，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要经常审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要防止自己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要在无产阶级面前保持谦虚谨慎。我们的建议书发表以后，有一位在内地某中等城市领导上万人的大规模群众维权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同志给了我们如下的鼓励：

这篇文章好！把方向性的问题基本分析清楚了。这个答案（地方工农民主政权）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参加运动自己感受出来的。这篇文章基本立场旗帜鲜明，是基于取代对手而不是向对手要东西的立场写的。所以整体逻辑一下子就通顺起来了。这才是革命文章。有许多观点，我过去都没有想到过。这个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属于那种把书读透了的人，所以可以得出和现实运动中一致的观点。这就是马列毛如何起家的秘密了。

对于佳士斗争（指出了其）幼稚手段的单一，对于资产阶级（指出了其）严酷性，而又从严酷性推导出对手的虚弱性，从而指出一个正确的斗争方向。这显然是马列毛的辩证法思想。基于颠覆，而又相反相成，唯物辩证法就是这样演进的。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观点，在于提出向工人学习斗争经验，这个太有价值了。其实对于一切行业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都要学习，不独（产业）工人。

只有触及对手的实际利益，才能打败对手，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佳士（声援团）他们怎么都不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方最大的利益，就是存在，就是肉体安危；小一点的，就是财产、官位、面子等等。这不是残忍不残忍的问题，也不是危险不危险的事情，而是斗争的合理性问题。可是许多自称马列毛主义者的人一到这一步就退缩了。

尤琳同志，你看，有过一线斗争胜利经验的同志与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认为我们的建议书还有一些价值。你看，你们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对我们的建议书的评价？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打击资产阶级！而不是让资产阶级打击我们自己。我们红色中国网的大门对于“声援团”的同志是永远敞开的。无论是线上线下的交流，我们都欢

迎。我们的信箱你们有，我们的地址你们也有。你们想通了，想要找我们谈心，我们欢迎。你们想不通，想要当面批判我们，我们也欢迎。

望你和同志们珍重并祝胜利！

严元章同志与“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经验

远航一号（2019年1月）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

佳士工人争取建立工会的斗争失败以后，在马列毛左派内部关于此次斗争经验教训的讨论中，很多同志都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政治专制），要不要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怎样进行公开合法斗争？

首先，必须要澄清一个概念，公开斗争不等于合法斗争。合法斗争一般来说也是公开的，但是公开斗争却往往不是“合法”的。比如，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工人斗争和群众维权斗争，必然要有大量普通群众参加，因而必然采取公开的形式。但是，这些斗争是“合法”的吗？虽然中国现行宪法承认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但是，在各种具体法律中（如《刑法》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各种“政策”和“意见”中、在各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各种法规中，实际上严厉限制人民群众的上述自由；而对于一切危害资产阶级财产权的“群体事件”，当局实际上是完全禁止，对于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则通常都要出动专政机关给予镇压。所以，中国目前绝大部分的群众斗争虽然都是公开的，但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就是说，不合资产阶级的“法”。但是，这不等于说，群众斗争就不可以进行，更不是说，群众斗争不可以取得胜利。

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国家使用专政机关的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代价、有条件的。由于财力人力的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在同一个时间能够动用的军力警力只有有限的数量；一个省的警察乃至武警如果遇到较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者同时发生的多起群众斗争，往往就捉襟见肘。对于一般的群众斗争，除非有上级死命令，警察是否出动，还要看涉及斗争的资本家平常与地方政府的亲疏远近、“上供”多少。另外，虽然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就是镇压劳动群众对资本家的反抗，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合法性”也不能完全不顾忌。这里所说的“合法性”，不是法律条文上合法与否或者对于一般社会舆论的顾虑，而是指某一次具体镇压可能给资产阶级国家带来的长远的副作用。任何一次镇压，一方面可能取得维护一小部分资本家利益的直接效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起着反面教育的作用，促使直接间接受到这次镇压影响的一部分群众抛弃对资产阶级国家的幻想，乃至成为未来变革的积极分子。对于这种反面教育的作用，资产阶级国家也不能不考虑，要尽可能地缩小它的范围和强度。所以，尽管资产阶级国家对于劳动群众的反抗总的来说是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这种镇压，还是要受到资产阶级法律和“政策”的某些约束；比如，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出人命。由于上述的这几方面原因，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群众能够充分发动起来，所动员的目标既是明确的又是有限的，其所要求的让步在资本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镇压的代价又比较大，那么，群众斗争就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

关于群众如何进行公开但不合法的斗争，在现实斗争中，无论是新老工人还是其他劳动群众都积累了大量经验，此处不再赘述。这里要谈的，是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首先要了解的是，在当前中国，为了争取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直接而迫切的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抛弃合法斗争的幻想，必须坚决依靠当时当地群众的力量进行不合法但公开的斗争。但是，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仍然可以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进行合法斗争。这里说的“合法”斗争，并不是纸面上合乎宪法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的条

文规定。在现在的中国，在纸面上是否合乎宪法和法律，与资产阶级国家在实际上会不会镇压只有十分间接且不确定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一般有实际斗争经验的同志都懂得；但是，只受过书本教育的左翼青年却往往不懂。除此以外，常常以“非政府组织”等名义组织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由派积极分子由于其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也往往不懂，或者虽然懂得了，却无法应用其经验教训。

这里说的“合法”斗争，是特指，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根据长期政治实践以及大量生活常识可以判断资产阶级国家一般不会镇压或者至少不会轻易镇压的那种群众斗争。下面就以 2018 年初围绕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八青年”网上追逃问题所开展的斗争为例，来说明一下一次比较成功的合法斗争是怎样进行的。

严元章与“八青年关注团”斗争策略的形成

对于这次斗争的实际情况，许多左派同志仍然不了解。现在，为了说明当时的斗争经过，尤其为了与佳士斗争失败的情况相对照，以利总结经验教训，有必要把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讲出来。我们知道，在“八青年”斗争初期，是有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但是，到了 2018 年一月份，这次斗争就已经明确是由马列毛左派领导的。一月下旬号召成立“八青年关注团”的公开倡议书是由古老、吴老、勤德老、景刚同志、时迈同志等左派领袖领衔发起的；但是，在具体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实际上是严元章同志和左向前同志。特别是严元章同志，在确定此次斗争的基本策略方针上，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下面的内容，主要根据笔者个人记忆撰写而成，若干细节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整个事件的基本脉络还是可以说清楚的；一切不准确或违反事实的地方，当然由笔者个人负责。）

说起严元章同志，很多青年同志还不了解，甚至还有人，以为他不过是一个关心老工人的普通积极分子，多年来“一事无成”。这样的认识，都是不正

确的。严元章同志，在马列毛主义的队伍中，已经奋斗了二十多年，有着相当的理论素养和最丰富的实践经验，经历和处理过各种复杂情况，是中国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第一流实践家。他的工作成绩，不仅许多同志了解，就是对方，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承认的。过去，因为严元章同志本人的谦虚谨慎，我们对他的成绩宣传的不够。

在 2017 年下半年，广州工业大学读书会被广东番禺警方破坏，其中四人被捕，另外四人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此后，以左翼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发出了一份措辞十分婉转、自由派立场较为突出的公开信。该公开信的呼吁重点，是要求解决作为原北大学子的张云帆的个人问题。公开信发出后不久，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虽然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当时当局“从轻”处理张云帆等四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可以推断，当时当局并未把“八青年”当作重要而危险的活动家，而认为他们只是一般的热心青年。拘捕和释放，都是地方警察当局做出的决定。对于地方当局来说，纯政治性案件占用他们的大量警力资源，但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与直接威胁当地资本家利益的工人斗争有很大不同）。

张云帆等四人被取保候审后，又联络曾经在上一封公开信上联署的左右派知识分子，希望他们继续呼吁当局撤销对他们的“取保候审”措施。但是，原来在公开信上签名的知识分子都不抱积极态度，劝他们“见好就收”。在张云帆等四处碰壁以后，他们先是与正在北京的左向前同志取得了联系；经左介绍，由青鹰社的主要负责人面见严元章同志（严元章同志当时并不知道来人就是青鹰社负责人，来者用的是化名，但表示可以代表“八青年”）。在那次谈话中，严元章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斗争策略。

第一步，“八青年”应该公开打出马列毛主义的旗号，不要再依靠自由派知识分子，而要全心全意依靠左派群众。具体宣传策略上，不要突出张云帆及

其北大背景，而要全面宣传“八青年”；公开的斗争目标，是要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

第二步，在对“八青年”做全面宣传和发动左派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八青年关注团”，发表公开信。

最关键的是第三步（但这最后一步后来并没有落实）。在公开信发表数日以后，由当时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同志主动前往公安局“投案”。

为什么要有第三步，这是当时一些左派同志所不理解的。在内部交流中，严元章同志做了解释。根据以往的经验，没有理由认为，仅仅因为左派群众的公开信（无论联署者中包含多少“名人”），当局就会做出让步，哪怕是像撤销网上追逃那样微小的让步。所以，这次斗争的主要目的，对外是争取撤销取保候审和网上追逃，而实际的主要目的，只能是以此为契机，扩大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不仅争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且从自由派手中夺得以争取一般资产阶级政治自由为目标的斗争的领导权。

为了真正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有前两步是不够的，而必须要有第三步。四青年如果果然去“投案”，我们估计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也是最有利的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出乎对方意料之外，对方决定不抓，只是要求四人办理一定手续，然后释放。如此，则斗争取得胜利，四人免除了后顾之忧，左派政治影响扩大。第二种情况，四青年去了以后，随即被羁押。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分析，读书会事件本身，尚未被当局认定为严重案件，且案件的“主犯”已经被取保候审，那么作为被网上追逃的四名“从犯”无论如何是不会“从重”处理的。所以，有很大的可能，四人被关一个短时期以后，当局便将他们草草结案、“教育释放”了事。

如果发生了第二种情况，一方面左派可以扩大宣传，另一方面，被捕四人可以得到锻炼，而他们不畏惧网上追逃、主动“投案”的英雄气概将大大鼓舞左派群众和进步青年，对于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十分有利。所以，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左派都可以取得胜利。

这里要说明一下，有的缺乏政治经验而尚未摆脱小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指责严元章同志冷酷无情、利用青年同志的牺牲来吃“人血馒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谭嗣同先生曾经说过，未曾有过革命而不流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吃“人血馒头”是世界革命的一般规律。当然，由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多年来的斗争，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比以往要“文明”一些了。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做进步事业，虽然要冒牢狱之灾的危险，但一般来说已经没有性命之虞了。仅就牢狱之灾来说，严元章同志年轻时，曾经两度被捕，严元章同志的战友也有狱中斗争的经验。所以，要说吃“人血馒头”，那上面也有严元章同志本人的几滴血。

即使从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角度来说，如果四青年果然去主动“投案”了，出名、当英雄、积累政治资本的也是四青年，而严元章同志不过是一位不被海内外媒体提及的无名英雄罢了。

要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做进步事业，完全没有牺牲是不可能的。为了事业的个人牺牲在许多时候是必要的，但是，要把牺牲的程度限制到最小，而把牺牲所能换来的胜利争取到最大。我们也不是完全反对宣传个人，英雄往往是普通群众认识并了解一个政治派别最直接、最具体的窗口。只要对扩大整个马列毛左派的政治影响有利，而被宣传的同志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荣誉，就可以并且应该大力宣传在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左派英雄人物。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如果能够以四名同志被短时间关押为代价，换得左派在宣传方面的巨大胜利，在政治上是有利的；而一个短时期的狱中斗争经历，对于四名同志今后的成长，也将发挥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八青年关注团”的前前后后

上述斗争方案确定后，在北京的“八青年”代表也赞同。随后，便开始了全面宣传“八青年”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张云帆的“我的自白书”发表开始的。这份“我的自白书”在发表之前，曾经严元章同志多次修改。

在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中，“八青年”十分积极，动员了他们本身以及他们背后的青年团体的各种技术和宣传手段。“八青年”的事迹迅速传播，广大左派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接下来，严元章、左向前等同志与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左派队伍中各个小组的代表人物直接联系，说明此次斗争的重要意义，争取到了所有起主要作用的老同志及左派内部除求是系以外其他各小组的支持。马列毛左派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公开发起了“八青年关注团”。

“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是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的，起草后，征得了三十几名发起人的同意。出于策略需要，在发起“八青年关注团”的倡议书中，在若干地方，引用了习近平先生的言论。此外，为了给整个计划中的第三步做铺垫，倡议书中提及，“关注团”将劝说被网上追逃的青年前往北京市公安局“主动说明情况”（我们提到北京市公安局，也是考虑到，万一发生不利情况，北京市的看守所比其他地方要“规矩”一些）。对此，一些青年同志表示不理解，在倡议书即将发表的当夜，还横生枝节，说我们没有“资格”替青年同志做决定（指前往公安局），而他们倒好像有“资格”可以强行修改已经由三十几名社会知名人士签署同意的倡议书。当时在北京的同志拿不定主意，严元章同志征求了其他同志的意见以后，坚决顶住了个别青年的无理要求。倡议书终于得以正常发表。

在倡议书发表后，张云帆突然代表“八青年”提出意见，认为我们软弱投降、青年同志接受不了。他们所掌握的宣传手段，对于这份倡议书，采取消极怠工的办法，不推广不宣传。由于他们的抵制，使得“关注团”倡议书发表后，在最初几天，签名联署的进度不如预期。这时，左向前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扭转了被动局面。数日后，倡议书获得了1500名各界群众的联署参加。

2018年一月底，倡议书发表后，按计划应当以“关注团”名义发表公开信。关于致公开信的对象，我们考虑，级别不宜太低，那样没有政治影响，但是也不宜太高，那样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只会给外界造成左派没有力量的印

象。所以后来的公开信是致公安部长，职位不低但也不是太高，且取保候审、网上追逃等都属公安部管辖范围；我们致信公安部，名正言顺。

致公安部信，由严元章等同志起草，然后由在京的绝大部分“关注团”成员参加的大会通过。在会上，经部分老同志要求，决定该信只递交公安部，不在网上公开。以上工作做完后，在北京的同志准备安排向公安部递交。这时，远航一号同志提醒，这是以“关注团”名义递交的信，要替联署参加“关注团”的全体同志负责；尽管信件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但并未经全体“关注团”成员同意；我们不能为了单纯图方便，就违反工作原则。于是，掌握关注团信箱的同志紧急将已经在京“关注团”成员大会通过的致公安部信草稿发给全体“关注团”成员，并特别说明，凡是不同意的可以退出“关注团”。后来，除个别几人声明不参加这封信（因而自动退出“关注团”）以外，绝大多数同志都参加了这封信的联署。在北京的同志，根据“关注团”成员表态的情况对联署名单做了修改，随后，派代表向公安部信访处递交了联名信。

在完成了向公安部递交联名信的工作以后，本来，按照原计划，要进一步加大对“八青年”的宣传力度，然后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要大张旗鼓地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投案”。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向“八青年”陈述了这样做的好处以及这样做了以后，风险、代价很可能极小。“八青年”当面也表示同意，但每次都以某种借口拖延下来。此事只好作罢。

原定策略中关键的第三步没有能够实现。这样，“关注团”事实上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手段，而只能被动等待对方的反应。与此同时，为了维持宣传力度，同时也为了解决“八青年”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决定由“关注团”出面发起为支持“八青年”坚持斗争、维持生活而进行的捐款活动。当时，为了确保捐款用于正当的目的，还指定勤德老与另外一位老同志监督捐款的使用。

到了春节前夕，广东警方派人来北京，联系被网上追逃的四青年，希望他们办理一定的手续，然后给他们结案。当时四青年坚决拒绝。到了春节期间，

“八青年”从网上发现，原来对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了；此前，广东警方通过一个中间人给“八青年”中一位主要人物也传递了同样的信息。

春节后，严元章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逐渐了解到，四青年的网上追逃已经撤销，便通过关注团信箱将此消息通知了全体“关注团”成员。这一消息发出后，“八青年”中的主要负责人大为不满，向严元章等同志提出“严正异议”。他们认为，广东警方撤销网上追逃是左翼“在舆论上对广东警方形成巨大压力”导致的结果，左派已经“占据十分主动”的地位；所以，决不能“偃旗息鼓”，而要“乘胜追击”、“宜将剩勇追穷寇”；要逼迫广东警方公开告知网上追逃已经撤销，这样“八青年”才能得到“光明正大的合法消息源”，使得“撤逃事件有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他们认为，只要“关注团”再发公开信，左派群众再纷纷致电番禺警方，番禺警方就一定会“惊惧于”我们的压力，使得左派获得“政治上的全面胜利”，进而还能争取到“整个青年左翼今后的发展空间”。基于这个估计，“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认为，应当对“关注团”封锁消息，“按照不知情持续斗争”；而严元章等同志向“关注团”通报情况，破坏了他们的计划，是没有与他们“统一步调，统一行动”，还说，如果严元章等同志不能与他们“意见统一，步调一致”，将涉及到严元章等同志“在左翼中的声望和名节”。

受严元章同志委托，远航一号同志给“八青年”代表回信，驳斥了“八青年”关于所谓“声望和名节”的荒唐论调。远航一号同志指出，虽然对方主动撤销网上追逃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但这并不表示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八青年”斗争，左派已经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可以公开的力量；而“八青年”捐款又在事实上吸收了左派的全部机动财力。如此大的左派力量长时间地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其前途是很危险的。远航一号同志的警告，在几个月以后，不幸而言中（见本期杂志的“远航一号致八青年负责人”）。

在意识到严元章等同志无法接受他们的所谓“乘胜追击”的主张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单方面召集在北京的部分“关注团”成员开会，然后

想以“关注团”的名义发表致公安部的公开信，提出要求广东警方道歉、严惩迫害“八青年”的责任人、赔偿“八青年”损失等不切实际的要求。严元章等同志了解到有关情况后，认为，以“关注团”名义发出的公开信，不可以轻易使用；频繁发出公开信，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要求，而又实现不了，不但不能显示左派的力量，反而会破坏左派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

当时事出紧急，远航一号同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在红色中国网上公开发文，明确表示，一切未经正当程序、未经“关注团”全体成员同意的文件均不得以“关注团”的名义发布。经远航一号同志警告以后，“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有所克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安部递交了信件。

到了三月份，严元章、左向前同志多次提醒“八青年”，应该公布捐款的使用情况，但是“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迟迟不办，后来只公布了一个粗略的使用情况。在公布了“八青年”捐款的粗略使用情况以后，关注团信箱停止使用，“关注团”在事实上停止了工作。后来，听说“八青年”内部对于捐款的使用分歧很大，是造成“八青年”分裂的原因之一。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如果“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捐款使用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种问题应当不是某些个人的滥用（就是说，不存在个人贪污行为），而是该负责人背后的某个组织从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占用了这笔捐款。

“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

虽然“八青年”（特别是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在 2018 年初的斗争中存在着种种问题，但总的来说，他们是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作为整个马列毛左派的一部分与当局进行了斗争，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在“关注团”斗争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后来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短时间内恶性膨胀，并终于导致了“佳士声援团”斗争的失败。

关于佳士工人的斗争和“佳士声援团”斗争的整个情况，严元章等同志不能说完全了解。但是，对于整个斗争，严元章等同志一直是关注的，与“声援

团”的代表保持着交流，并尽了最大努力来减少“声援团”的损失。这里，仅把严元章等同志所了解的一部分情况做一个介绍。

如红色中国网工作组在致青年马列毛左派积极分子的建议书中所指出的，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条件下，一般来说，以建立公开的、由工人民主控制的工会为直接目标的斗争是必然要失败的。所以，佳士工人要求组建工会的斗争，无论是佳士工人自发要求的产物还是经过左派青年“灌输”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另一方面，在珠三角地区，如果组织得当、目标合理，以具体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工人斗争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胜利。比如，“声援团”大力宣传的尚杨雪同志，原来并非佳士工人，也非“声援团”成员，这次是因为替佳士工人打抱不平才与佳士的工人积极分子一起被捕的。在被捕前，尚杨雪同志曾经领导另外一个工厂的工人争取迁厂补偿并取得了胜利。可见，如果佳士工人能够以佳士资本家所谓“十八禁”中最为广大工人群众痛恨的某几项为主要斗争目标，是有可能给资本家造成一定的打击并给工人带来一些具体利益的。所谓没有“工会”，就不能搞斗争，这是一部分“声援团”同志在斗争已经失败以后仍然拒绝总结经验教训的托词。

在十几名佳士工人积极分子被当地派出所抓走以后，应当说，佳士工人争取建立自主工会的斗争已经失败。这时，“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不是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决定下更大的赌注，贸然决定发动整个左派来开展声援。

对于大多数左派同志来说，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利用“关注团”时期建立的关系，给几位发挥主要作用的老同志、乌有之乡还有严元章同志打电话，并广发信件，要求所有左派积极分子表态声援佳士工人。他们既不说明斗争的目的和计划，也不准备与左派各小组协调行动，只是单方面地要求别人无条件支持、无条件服从他们的调遣，谁不听从，谁就是“不革命”。许多左派同志在仓促之间表态支持，也有许多左派同志没有表态。然后，在几位老同志和严元章同志都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就被宣布为是

“佳士工人声援团”排名最靠前的几位成员。从此以后，原“八青年”背后的那个组织就打着“声援团”的名义随意发通知、发文件、发公开信，从来也没有征求名义上是“声援团”主要成员的几位同志的意见。所以，所谓“声援团”并非像“关注团”那样，有广泛的左派群众基础，也没有正当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而只不过是原“八青年”背后那个组织用来对外宣传的一个外壳罢了。

到了八月初，“声援团”的颓势已显。严元章同志很着急。虽然严元章等同志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声援团”的错误路线，但是，严元章同志指出，这些青年同志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能减少一分损失就减少一分损失。当时，严元章等同志已经意识到，“声援团”的斗争形势已经好比1989年“六四”以前的情况，镇压迫在眉睫。严元章同志尽了最大努力，动员了他在体制内的关系，希望通过谈判的方法来尽可能实现声援学生的和平撤退。令人遗憾的是，严元章等同志始终无法联系到“声援团”的实际负责人，谈判的尝试无疾而终（他们的“严密组织”，瞒不了敌人，但是专门瞒自己的同志，左派同志谁也不清楚他们那里到底谁说话算数，有重大问题该找谁商量）。八月中旬，古老、严元章、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开会。古老明确批评了“声援团”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声援”；严元章同志建议“声援团”能够主动撤退、减少损失。原“八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在明确意识到斗争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强行坚持全国各地的左派学生团体前往深圳“声援”，终于导致这些积极分子在七月底的镇压中全军覆没。

八月底镇压后，“声援团”仍不放弃其冒进路线，一面指责左派同志没有为了他们“挺身而出”，一面自我评价“越战越强”，要对“广东黑警”开展“乘胜追击”，结果导致了更大范围的镇压和更多的损失。

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怎样进行“合法斗争”

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往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下，劳动群众不仅可以为了争取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反抗压迫和剥削而开展斗争，而且还可以取得相当的胜利。这样的斗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是公开的，又是“非法”的。这种“非法”，有的是形式上非法，即直接违反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有的是形式上不非法，但是根据社会经验和生活常识，人们都知道资产阶级政府是必然要设法镇压的。但是，只要当时当地的阶级力量对比对劳动群众有利，即使“非法”的斗争也可以取得胜利。

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其他劳动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也有可能为了某些目的而进行合法的斗争。合法斗争的前提，不是在形式上是否合乎资产阶级的法律条文，而关键是造成资产阶级不镇压或者不扩大镇压的条件。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实行了正确的斗争策略，那就是，在表面上以请愿的方式承认资产阶级当局的合法性（引用习言论），同时在对外宣传中，将“八青年”包装为虽然信奉马列毛主义但是主要从事社会公益、在政治上对当局无威胁的天真青年。虽然制定了这样的斗争策略，严元章等同志仍然认识到，仅仅依靠公开信和社会舆论是不可能真正给当局造成压力的；公开信和社会舆论的主要作用是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所以左派和“八青年”必须做好最坏的准备，即四人主动去“投案”。但是，由于采取了上述的正确斗争策略，就可以保证，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左派和“八青年”的损失也是十分有限的乃至微小的。

相比之下，佳士工人的建会斗争已经直接危害到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则直接威胁到了深圳、广州一带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在此之前，“八青年”以及后来主要由原“八青年”主要负责人控制的时代先锋的高调宣传已经将自己的“革命”底色暴露无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声援团”同志的真实面目已经暴露了，资产阶级当局已经识别了他们的企图和目标，到了这个时候，再涂多少层保护色都没有用了。

令人唏嘘的是，正是在“声援团”被镇压已成定局、合法斗争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的时候，“声援团”的同志反而越发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所进行的是“合法”斗争。他们放下身段，用各种各样恳求和哀婉的文字向资产阶级的“中央”呼吁，乃至回顾起青鹰社某负责人被“中央领导”“亲切接见”的情形。相比起“八青年关注团”时期，他们对于在倡议书中引用习先生的一些言论都感到十分厌恶、不能容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革命形势来临以前的整个时期，无论是非法斗争还是合法斗争，面对的都是占优势地位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可以利用一定的局部、暂时的有利条件争取到某些斗争的胜利，但是这样的有利条件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所以，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条件下的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都必须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而斗争目标又必须是有限的，既要争取到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一部分利益，又要避免触及对方的根本利益。作为整个力量对比占弱势的一方，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准确地评估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随时掌握斗争的主动权，是斗争胜利的关键。

在“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中，严元章等同志在一开始就确立了以扩大马列毛主义的宣传和政治影响为斗争的最基本的目标（即最低目标），而以争取广东警方撤销对四青年网上追逃为最高目标。以前者为最低目标，是因为前者的主动权完全把握在我们手里。以后者为最高目标，是因为我们不是广东警方的参谋长，撤销不撤销网上追逃，这个主动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完全掌握在对方手里。但是，这个让步，对于对方来说，并不是要紧的、致命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任何超出撤销网上追逃的各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则是不能实现的，反而会使左派陷入被动。比如，哪怕是要求广东警方公开道歉，如果番禺派出所长真的这样做了，他的派出所长就不要干了；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对方拼了命也要跟你对抗到底。

在实际斗争中，虽然受到一些干扰，第一步和第二步都基本按原计划进行。但是，当“八青年”中的四青年拒绝实行第三步以后，“关注团”实际上

已经部分地丧失了主动权。如果对方坚持不撤销网上追逃，我们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选择适当时机，组织撤退，结束“关注团”工作。但是，接下来，对方犯了错误，暗中撤销了网上追逃。这样，我们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主动权又回到我们手中。重新掌握主动权以后，把握斗争的度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当时，“八青年”主要负责人头脑发热，主张要“乘胜追击”，用舆论形成“巨大压力”，取得“一个高度政治性的光明正大的收尾”。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就把刚刚侥幸回到我们手中的主动权又完全奉送回去了。因为一旦我们发起舆论的“巨大压力”，接下来，能不能得到一个“光明正大的收尾”就完全不是我们说了算，只能看资产阶级的脸色了。

再来看佳士工人和“佳士声援团”的斗争，由于他们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一个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公开的民主工会，所以每一步都陷入被动。他们先向资本家请愿搞工会，结果反而被资本家勾结黑社会迫害；然后他们又向必然要与资本家站在同一立场的警察当局求救，结果反而被警察当局抓捕；然后又幻想靠舆论声援、街头抗议就能够“营救”被捕的同志；最后，当失败已成定局时，又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全国各地进步学生力量作为最后的赌注全部押上。每一步，他们制定的都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陷入被动以后，不但不反思，而是像屡赌屡输的赌徒那样，押上更大的赌注，总是幻想“下一把”就能把“本儿”翻回来，结果终于全部输光。

一支聪明的能打胜仗的军队，必须不仅懂得怎样冲锋，而且懂得怎样撤退。只知道冲锋而不知道撤退的军队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作为整体力量占弱势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一方，在斗争中经常要面临撤退的问题；掌握好撤退的时机，有利时可以确保斗争胜利成果（如“八青年关注团”的斗争），不利时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比如，在“佳士声援团”的斗争中，在一开始工人积极分子被黑社会迫害的时候，在一批工人积极分子被抓捕的时候，在国内外声援佳士斗争的各种舆论呼吁都不起作用的时候，负责任的领导人都应该组织撤退。

由于佳士斗争的领导人从一开始制定的斗争目标就是错误的，一旦撤退，当然要忍痛放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可能指责他们“见死不救”、有些小资极左青年可能污蔑他们是“逃跑投降”）。但是，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有远见的领导人敢于负责、敢于担当骂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进步力量更大、更残酷的损失。不仅如此，只有及时撤退，才能不仅保全力量，而且夺回并保持主动权，重新寻找有利的时机、有利的战场，再发起新的有胜利可能的斗争。

佳士工人的斗争与“佳士声援团”的斗争失败了。这次失败，暴露了由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组成的青年左派团体的严重局限性。但是，这次斗争，毕竟是表明，大批小资产阶级青年开始与现存社会秩序决裂并向马列毛主义靠拢；这次斗争，也标志着由马列毛主义者领导中国新工人斗争的时代开始了。尽管“佳士声援团”在这次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策略，但参加这次斗争的许多青年同志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给广大进步青年以巨大的鼓舞。我们相信，在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必然会有一批青年同志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成为不仅能够勇敢地面对资产阶级镇压而且能够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战士。

远航一号致“八青年”负责人

(2018年2月)

某同学：

来信收悉。首先，请允许我们祝贺你们在过去几个月的斗争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关注团约 1500 名同志共同努力下所取得的。这一胜利，虽然是小胜，但是其意义是深远和重大的，将为今后的事实所证明。在整个斗争中，你们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最前方，已经成为所有左派青年的优秀代表。这些都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为你们所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骄傲，并且向你们的革命精神表示致敬！

你们来信，向我们提出“严正异议”。你们没有说“抗议”，而只是说“异议”，说明你们还是客气的，是留有余地的。那么，接下来，就谈谈咱们之间的“异议”。

你们指责我们，没有与你们“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在你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就将撤退消息通过关注团信箱扩散，让你们“深感震惊遗憾”。首先，应当说，作为关注团的发起人以及关注团信箱的管理人员，我们确实在这时期的斗争中发挥了较多的作用。但是，仅仅因为我们发挥了较多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凌驾于关注团之上，也没有权利代替关注团做出重大决定。所有关注团成员，既然在公开信以及致公安部联名信上签了名，就都有权利及时了解事件的进展。单方面地、长时间地向关注团封锁真实情况，是不正确的。

当然，在向关注团发布消息之前，我们没有再耐心等待一下，与你们充分交换意见，确有考虑不周之处。另一方面，如果要“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那就一定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你们说，你们从来没有不与我们沟通，就“擅作主张”。这恐怕也不尽符合事实。A、B、C 等同志都分别反映过一些情况：比如，你们的代表在向谷老汇报关注团倡议书的准备情况时，就不够准确和真实，几乎破坏了倡议书的及时发布；比如，你们自己或者你们的同学在转发关注团倡议书时自行加上批判倡议书的内容，一度影响了倡议书的签名进度；再比如，你们擅自使用关注团信箱，结果导致信箱崩溃；凡此种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对于你们这些擅自行动，包括一些几乎引起重大不良后果的擅自行动，我们并没有急于指责你们，乃至提出“严正异议”。因为在我们看来，不同团队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差别，是完全正常的，只要不影响大局，就不要轻易地批评和指责，更不要动摇同志间的基本团结，乃至上升到什么“声望”和“名节”的高度。

我们中间，仅 A 同志一个人的坐牢时间，就比你们四位进过看守所的同志的监禁时间加起来还要多好几倍；B 同志也是几次被“监视居住”的；C 同志敢于斗得地方政府待他如上宾。我们还害怕什么“声望”、“名节”问题吗？

你们说，如果不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做，就会涉及我们与你们今后还能不能“合作”下去的问题，就会涉及到你们还是否以我们为“同志”的问题。后一点，你们是以比较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同样作为马列毛主义者，对于这两个问题，怎么会有任何丝毫的怀疑呢？！毛主席与王明、张国焘之流那样大的斗争，只要他们不公开叛党，也始终是以同志相待的。我们之间能有多大的分歧，能够扩大到相互怀疑是否为“同志”的程度？

至于说“合作”，同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之间不合作，难道去与反动派合作吗？无论意见怎样不同，争论怎样激烈，方式如何不同，我们之间，总是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团结下去、合作下去的。难道不是吗？

关于目前的斗争策略，你们和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意见分歧。你们的基本意见是，不要“偃旗息鼓”，而要“乘胜追击”，“在舆论上压制对方”，首先迫使对方公开承认取消追逃，即认错，然后再视事态发展，进一步扩大战果，乃至为全国左翼青年争取到“发展空间”。

你们这个策略意见，是我们所不赞同的。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基本形势下，斗争的目标必须是有限的，确实有把握的，而对左派力量的动员则应当是慎重的。

当前的基本形势，既不是革命形势也不是革命形势前夜，而是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国家机器是要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要经常镇压工农劳动群众以及各种进步力量的。这点马列主义常识，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都是有的。在这样的基本条件下，想要完全停止资产阶级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是不现实的。

虽然资产阶级对进步力量的镇压必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我们可以努力缩小其镇压的范围、限制其镇压的程度。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可以采取的策略，大概是这样几种。在平时，在多数情况下，首先要保存自己，以达到与对方斗争的目的。为此，就要按照在“白区”斗争的原则，注意隐蔽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以实现长期隐蔽、持久斗争。

当资产阶级的镇压已经不可避免时，在多数情况下，首先要不怕坐牢、不怕镇压。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一般来说，是用不着“抛头颅、洒热血”的，无非是受些皮肉之苦。只要我们确实不怕坐牢、不怕镇压，就能够在精神上压倒对方，并充分鼓舞一切进步青年和工农群众开展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斗争。

在个别情况下，当各方面情况确实对我有利时，可以动员左派力量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即策略清晰、目标有限的斗争，以达到制止资产阶级某一次具体镇压的目的。此次斗争，便属于这种情况。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认为，显示左派力量、制止对方镇压这一具体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应当考虑，把我们的力量转到更广阔、更全面的斗争中去。

在你们看来，如果我们再加以新的“舆论压力”，资产阶级的上层就必然因为害怕我们，而给他们的基层警方以更大的压力，进而迫使基层警方公开认错，以实现你们所说的“全胜”。这里，有个问题，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害怕你们或我们的舆论压力呢？

必须指出：我们从这次斗争一开始，就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单纯的“舆论”压力之上，这是我们在多年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一条基本经验。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劝你们把斗争的决心放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必要时，不怕主动去坐牢。

当然，资产阶级为了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也为了节约其镇压成本，是不可能无限度地使用其镇压力量的，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有时也会采取“怀柔”的办法。对此，我们当然可以加以利用。我们在公开信中，之所以要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并且不惜反复提及“习思想”，就是要利用资产阶级这一镇压的限度，并向资产阶级上层试探妥协的空间。但是，这种利用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你们的“乘胜追击”，如果实现了，那当然皆大欢喜。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资产阶级上层当做傻瓜，认为他们会简单地按照我们的指挥棒来转，或者被我们几封公开信就吓得不会思考了。你们的良好愿望，是通过基层警方公开道歉，取得“全胜”，并因此鼓舞全国左翼青年大胆开展斗争，取得充分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点，资产阶级上层难道不会想到吗？他们如果符合你们的心愿，开了这个口子，接下来的发展难道会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吗？为了避免这种不利局面，他们难道不会有所行动吗？到那时，资产阶级上层是不是还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不是由你们或者我们说了算的。

对方这次主动退了一步，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继续逼上去一步，就仍然会处于主动的地位。我们做一切事情，都不能凭侥幸心理，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出发。不能够只想，如果事情顺利会怎样，还必须有准备，事情不顺利，又会怎样，对你们、对左派会有怎样的损失。

为了这次斗争，我们已经动员了左派绝大部分可以公开的力量，以及左派实际上几乎全部的机动财力。这样大的力量，长时间暴露在资产阶级面前，这对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如果我们过度使用这支力量，使得资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确有必要，可以不顾微小的舆论成本，来镇压我们，这于大局又有何益处呢？或者他们不理睬我们，任凭我们自行消耗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们借着我们在舆论上自我暴露的时机，积极收集与我们相关的各种情报，这于大局，又有何益处呢？

当然，如果对方对你们有新的迫害措施，我们是必须而且应当反击的。我们现有的力量（包括舆论、法律、经济等方面）应当保留下来，准备迎击资产阶级可能实行的新的迫害。如果确实有这种新的迫害，我们再进行反击，不仅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再次动员左派群众，中间派群众也可以被我们说服，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也会加剧（他们上下层之间意见不统一；上层会认为基层惹新的麻烦），我们将会有更大的胜利把握。以目前来说，保存我们的力量，引而不发，比现在就把我们的底牌全部暴露出去，要有利得多。否则，一旦对方翻脸，我们将完全没有任何应对办法。

你们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志们啊，那可是主席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夜写下的诗句啊！咱们现在是处于那样的历史条件吗？咱们当前

的条件，应该学习毛主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原则，积蓄力量，引而不发，保持主动，后发制人。

以上是我们的基本意见，供你们参考。如果你们仍然不赞成这些意见，认为有更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建议，召开在北京的关注团成员大会，将你们和我们的基本意见，分别提交大会讨论，并做出关于下一步斗争策略的决定（此决定仍须通知全体关注团成员并求得其中多数的同意）。

以这样的办法，来解决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分歧，你们以为可否？

路石、向前、远航、水边